

演化经济学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贾根良

2004.10

前 言

近几年来，“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经济学要实现现代化、国际化和标准化”的声音不绝于耳。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我也曾被谆谆教导，要像美国的经济学家那样，培养学生“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

然而，西方经济学界有那么多经济学流派，究竟和谁接轨？经济学家们可以大致上被分为两种类型，究竟要“像哪类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一类假定技术、制度、偏好和资源禀赋不变，在均衡的框架下，研究理性经济人如何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类经济学家采用了把偶然因素排除在外的决定论哲学观，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规律，数学建模、计量经济学和预测是其方法的特征。另一类则认为，技术、制度、偏好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这种变化的典型特征是非均衡的过程，资源创造而非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核心，经济行为者是按照得失权衡而非效用最大化原则采取行动的，经济研究要特别注重时间和地点的差异，比较的、制度的、历史的和解释的是其方法的特征。

熟悉经济学说发展史的人都知道，长期以来，这两类经济学家构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前一种的典型代表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后一种则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几乎所有异端经济学的共同特征。在笔者看来，后一种的典型代表就

是今天正处于大发展前夜的演化经济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这两种经济学是以互补的方式得到发展的（Dopfer, K., 2001），但到20世纪90年代，美欧国家所有的大学经济学系都已被新古典经济学所控制（Hodgson, G.M., 2002）。因此，按照笔者的理解，我们目前所谓经济学与国际接轨的提法绝不是指与演化经济学或异端经济学的某个流派接轨，所谓“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也绝不是意味着像演化经济学家那样思考。对流行的思维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和数学形式化的发展。

我曾经想过，作为一个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长大、经历了1979年思想解放运动的经济学者，我怎么还能够相信效用最大化和理性选择的学说呢？面对丰富多彩的经济现实，道格拉斯-柯布生产函数和哈罗德-多马模型等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我看来，经济学杂志上充斥着深奥的数学公式，这些都是科学主义的产物。被我国一些经济学者所极力推动的数学形式化，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而已。

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把它奉为主臬呢？自凡勃伦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就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这无法阻挡新古典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主流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谈论经济学的危机已久矣！但类似于物理学革命那样的事情在经济学中却没有发生。相反，到20世纪末，新古典经济学的地位却日渐巩固，现在它又成为我国经济学教育模仿的样板。面对经济学的这种状况，一些经济学家简直绝望了，以至于迈克尔·佩雷斯激烈地呼吁“经济学的终结”。

经济学革命的方式与物理学革命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在

经济学中，像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那样彻底涤荡陈旧观念的物理学大革命很可能就无法产生。与科学发现的任何逻辑相比，社会科学范式的变革更可能是社会政治力量变化的结果。对当时经济学状况深为不满的经济学家只能等待时机并潜心研究新的经济学说，而不是把精力过多地放在对已是强弩之末的主流进行批判上，因为他们早已是对任何异议都置若罔闻了。经济思想史的观察也告诉我，一种新型经济学的萌芽可以在主流经济学锁定非常严重的国度被发现，但它的成长和壮大很可能就要转移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如果某个国家的经济将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学也会成为大家竞相模仿的对象。

英籍德国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拉赫曼曾有言，不同的心智思考不同的事情。根据我的想像，就目前的形势来说，演化经济学将是中国经济学后来居上的主要领域，我们不能不对此有所准备。根据这种看法，与国内日渐西方主流化的趋势相反，笔者近年来把视野投向了对异端经济学的综合——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上。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为读者展示经济学的另一个世界，希望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对她产生认同，爱护她、批评她和帮助她，使她能在中国发芽、扎根，并成为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

可能这样的时机不会等待太久。当本书的写作接近尾声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早在 2000 年 7 月，由于法国经济学学生的请愿，“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在欧洲已经爆发，其矛头直接指向脱离现实和数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一场颠覆新古典经济学霸权地位的国际运动已经兴起。因此，笔者不得不临时修改了写作计划，在第六章对这个运动进行了介绍和评论。

这场运动将为演化经济学的大发展开辟道路，目前的经济



学领域又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期了。但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整体上已锁定美国经济学学术制度，这种星星之火能否产生经济学革命的燎原之势，我们就无法做出判断了。但毫无疑问，这种运动对中国经济学的西方主流化是当头棒喝，中国经济学界正面临着一种学术上的思想解放运动。

本书的出版正逢其时，但它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而是为这种思想解放运动提供证明，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经济学的全部，存在着比它更有用和更现实的经济学。在笔者看来，科学的真正精神是多元论的，新古典经济学无疑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完全被放弃，但它的霸权地位已造成了对学术自由的严重威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教训。因此，本书的出版也希望能促使人们警醒，放弃中国经济学新古典主流化和数学形式化的取向，采取渐进的和试错的改革办法，兼收并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育与发展之路。

作者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演化经济学：开创新的研究纲领	(1)
第一节 研究纲领和基本分析框架	(2)
一、新奇创生的内生性：研究纲领的硬核	(2)
二、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范式上的基本不同	(4)
三、基本分析框架	(5)
第二节 起源与发展概况	(8)
一、老制度主义	(9)
二、“新熊彼特”学派	(10)
三、奥地利经济学	(11)
四、法国调节学派	(12)
五、从系统动力学到“复杂系统理论”	(13)
六、演化博弈论	(14)
第三节 重大前沿理论问题	(15)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部将分化为两大阵营	(16)
二、演化经济学面临创造性的综合	(17)
三、演化分析框架：达尔文主义还是自组织理论	(18)
四、批判实在论与演化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20)
第四节 本书计划	(21)
一、艾伦论演化复杂系统的研究方法	(21)

二、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皇帝的新衣·····	(24)
三、本书致力于发展反数学化的演化经济学·····	(27)
第二章 演化经济学与科学哲学的“哥白尼革命”·····	(33)
第一节 批判实在论论经济科学·····	(34)
一、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的“哥白尼革命”·····	(34)
二、实验活动与本体论·····	(35)
三、回溯法与科学理论的创新·····	(37)
四、社会经济本体论与经济学的目的·····	(41)
五、经济学作为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	(43)
六、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比较科学·····	(45)
第二节 比较经济学：经验科学的总称与分支学科	
·····	(48)
一、比较经济学：经验科学的总称·····	(48)
二、比较经济学新的哲学基础·····	(50)
三、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缺陷·····	(52)
四、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55)
五、比较经济学新的研究任务·····	(59)
第三章 演化经济学与达尔文主义·····	(65)
第一节 经济学的重大转向：从机械类比到演化本	
体论·····	(66)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及其机械类比的局限性·····	(66)
二、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从生物学类比到	
演化本体论·····	(70)
第二节 霍奇逊和克努德森论经济学中的达尔	
文主义·····	(73)
一、新达尔文主义、拉马克主义与达尔文主义·····	(74)
二、拉马克主义为什么要嵌入达尔文主义·····	(76)



三、普遍达尔文主义·····	(78)
第三节 经济演化解释框架与现代流派	
问题 ·····	(80)
一、深入研究自组织理论·····	(80)
二、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	(83)
第四章 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I) ·····	(91)
第一节 老制度学派 ·····	(91)
一、老制度学派的起源·····	(92)
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94)
三、老制度学派范式的硬核·····	(97)
四、为什么说老制度学派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99)
第二节 奥地利学派 ·····	(102)
一、奥地利经济学共同的方法论基础·····	(103)
二、门格斯的原创性与奥地利学派的复兴·····	(107)
三、拉赫曼的激进主观主义·····	(111)
四、简短的评论·····	(114)
第五章 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II) ·····	(120)
第一节 “新熊彼特”学派 ·····	(120)
一、“新熊彼特”学派演化理论的兴起·····	(120)
二、知识、能力与组织学习·····	(123)
三、创新分类·····	(127)
四、创新:需求拉动还是科技推动?·····	(129)
五、国家创新体系·····	(131)
六、结语·····	(134)
第二节 法国调节学派 ·····	(135)
一、起源与研究纲领的形成·····	(135)
二、分析框架与理论观点·····	(139)



三、评论	(144)
第六章 21世纪经济学家的麦加	(147)
第一节 新古典经济学霸权地位的终结	(148)
一、“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	(148)
二、历史背景分析	(151)
三、“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简短评论	(156)
第二节 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	(161)
一、演化经济学四大流派的创造性综合	(162)
二、波茨和南丁格尔的建议	(166)
第三节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主要文件	(170)
一、法国经济学学生请愿书	(170)
二、法国经济学教授请愿书	(172)
三、剑桥大学27名博士生的公开信	(174)
四、“堪萨斯城建议”	(176)
第七章 脉象学派初探：中国的演化经济学	(180)
第一节 演化经济学与《易经》研究方法论	(181)
一、科学新思维与中国有机哲学	(181)
二、演化经济学与以《周易》为核心的演化思想	(182)
三、《易经·系辞传》研究方法论	(185)
第二节 脉象学派的本体论基础	(187)
一、“和实生物”：多样性与创新的基础	(187)
二、“道”与阴阳：演化的机制	(188)
三、“阴阳不测之谓神”：本体论含义	(190)
四、生成论	(191)
五、“性习论”：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	(192)
第三节 脉象学派的方法论原理	(194)
一、观物—取象—比类—体道：回溯法	(194)



二、阴阳反照：取象的方法·····	(195)
三、脉络主义：建立模型或理论的原则·····	(197)
四、型态模型·····	(198)
五、小结：为什么叫脉象学派·····	(199)
第四节 脉象学派的目标和经验准则·····	(200)
一、辞变象占：脉象学派的经济学目标·····	(200)
二、脉象学派的经验准则·····	(203)
第八章 后发优势的经济演化理论·····	(209)
第一节 后发优势：演化经济学基础理论·····	(211)
一、后发优势：宽广的概念和两种机会窗口·····	(211)
二、技术能力的发展：后发优势的基础·····	(215)
三、创新体系：技术能力发展的关键·····	(218)
第二节 后发制度创新的演化经济学假说·····	(222)
一、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	(223)
二、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	(229)
三、制度创新的脉络主义·····	(233)
后 记·····	(241)



演化经济学：开创新的研究纲领

自 纳尔逊和温特 1982 年出版《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以来，“演化”一词在西方经济学界越来越成为时髦的术语。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演化经济学的各种研究传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霍奇逊指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已成为 20 世纪末国际学术界主要的事件之一。但在这种多样化繁荣的背后，演化经济学是否存在着一个统一的研究纲领？本章第一节将首先研究这个问题，并概要地讨论它与新古典“现代经济学”¹的基本不同。其次，演化经济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凡勃伦 1898 年的经典论文，以 纳尔逊、温特和多西（DosiG）² 等为代表的学者只是演化经济学中的“新熊彼特”学派，那么，演化经济学应包括哪些不同的研究传统呢？第二节将简要地概述这些研究传统的起源和发展概况。再次，世纪之交的演化经济学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许多重大的前沿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第三节将对此做出评论。最后，第四节介绍艾伦对演化复杂系统研究方法的讨论，批评经济学的数学化，提出本书的研究计划。

第一节 研究纲领和基本分析框架

一、新奇创生的内生性：研究纲领的硬核

在“看问题的出发点”上，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是非常不同的。钱颖一先生曾对后者做了简洁的概括：“经济学家们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经济人（给定）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③在这种理论结构中，经济行为者被看做是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他们自身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创造这些条件，这些假定条件的新变化被看做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因而，现代经济变迁的许多重要方面就被排除在新古典经济学之外了，如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所以它不仅无法解释自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和结构转变这些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而且，它也无法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解释。因此，演化经济学家们不会同意钱颖一先生的这种论断：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上流的经济学是惟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

演化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持久的批评者，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为解释持久的经济变化过程，生产要素的投入（新古典经济学给定机制下人们通过相互作用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只是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则要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前提的变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换言之，它关键性地取决于“新奇的创生”^④。新奇的创生是永无休止经济变化的原因，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中它被处理为经济系统内生的。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 (being)



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中新奇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⑤。这两种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演化经济学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弗罗门(Vromen, J)认为，演化经济学不应排除新古典经济学，它的新颖之处就在于把正统理论中处于背景状态的演化力量和机制放在了核心地位，演化理论可以被看做是经济变迁的一般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则是其特例^⑥。而多普佛(Dopfer, K)却认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这两种经济学是以互补的方式得到发展的，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取得主流地位的。现在，在经济全球化、迅速的技术变迁和高强度的质量竞争这种环境中，演化经济学具有快速发展的优势，我们将目睹由此所产生的经济学革命。

正如威特(Witt, U)和霍奇逊所指出的，演化经济学的不同传统在其理论体系中都把创新放在核心地位，确实或多或少明确地同意新奇在经济变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是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因此，威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⑦威特从认识论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他认为，新奇在不同学科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如在生物学中，新奇涉及群体基因库中的随机突变和选择性复制；而在经济学中，给定这个学科集中在人类行为上，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性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就新奇的性质来说，人们不可能明确地预见到它的意义和含义，这是因为，当我们对一个问题寻求新奇的解答时，我们很可能事先要假定这个解答必须被满足的基本条件，但我们不可能理解这种新奇的大部分特征，否则它就不是新奇的了。正是新奇的这种性质使演化经济学形成了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当不同的研究范式。



二、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范式上的基本不同

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大量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最优（最大化）假说、类型思考和历史无关这三个方面，并相应地提供了替代性的要素。

第一，满意假说。由于不可能充分地预见到新奇的创生，也不可能预先知晓努力的特定结果，行为者就无法采取最优的行为，更现实的情况应该是试错过程。因此，演化经济学在西蒙“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提出的满意假说。根据这个假说，挫折破坏了经济行为者目前的抱负水平，从而使之产生了对新的、未知的选择进行搜寻的动机。在没有成功迹象的情况下，随着搜寻时间的延长，经济行为者的抱负水平将下降，最终将趋向于目前可行的选择，搜寻的动机消失了。反之，如果搜寻被证明是成功的，抱负水平将提高^⑧。在满意模型中，适应性抱负水平成为人们选择的依据，它考虑到了经济行为者过去的经验，而且，它也意味着经济行为者的选择是不会相同的。因而，这是一个历史模型。

第二，个体群思考(Population Thinking)^⑨。个体群思考是演化分析的核心特征，它在进化生物学中首先得到了发展，它与非演化的类型学思考(Typological Thinking)相对立。所谓类型学思考就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做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做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因此，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做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正是这种类型学的推理产生了新古典范式的给定偏好和个体同质性（代表性行为者）的假定，排除了多样性行为的可能，因而无法容纳个体的创造性和新奇行为。相反，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实在本身，它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因而，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中，强调了主观偏好

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第三，历史重要和时间不可逆。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因此，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就是突出了时间对社会经济系统最基本的建设性作用。多西和梅特卡夫(Metcalf, J. S)认为，经济社会系统的不可逆概念与这种可能性有关：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目前的行为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熵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但系统也不会回到最初状态，这体现了赫拉克里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哲学理念，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新古典范式的无时间和非历史性是众所周知的³⁹，路径依赖这个概念通过强调历史重要对其提出了挑战。路径依赖说明了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如相对无效的“QWERTY”打字机键盘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历史对于解释这种无效率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大卫的看法，制度和组织中的路径依赖产生于三种原因。首先，因为制度解决的是合作博弈，不同的预期是可能的，它们都对初始条件或事件敏感。其次，组织内交流的密码在投资上是不可逆的。最后，一种组织想应用和发展的工作和功能是内在相关的，由于新功能是相继增加的，他们就倾向于在选择的路径内得到发展⁴⁰。由此可见，这里“历史”并非简单地指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而是突出了经济过程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三、基本分析框架

两种经济学范式的根本差异源自牛顿和达尔文世界观的不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业已说明⁴¹，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瓦尔拉、杰文斯和帕累托深受经典物理学的影响，例如，瓦尔拉认为，“经济学的纯理论在每一方面都是类似于物理数学科学的一种科学”⁴²。在其理论架构上，牛顿力学的时间可逆、类型学思考和机械决定



论世界观，也是新古典范式的基本特征。相反，演化经济学的奠基者凡勃伦与现代开拓者纳尔逊和温特都把达尔文主义作为其类比和隐喻的基础，正是达尔文主义首先把时间不可逆、个体群思考和不确定性等引入到现代科学，特别是非平衡热力学等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演化这个统一的范式。正如古木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所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的，“自然科学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展现了一整套连贯的思想”^④，演化经济学家们认为，达尔文主义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⑤。

坎布尔曾指出，达尔文主义包含着所有复杂系统演化的一般理论。与达尔文主义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有关社会经济演化的完整分析框架也是由三种机制所构成的：遗传、变异和选择，但其解释必须考虑人类经济活动的特定方面，它远比生物演化更为复杂。

第一，遗传机制。正如生物基因一样，制度、习惯、惯例和组织结构等是历史的载体，它通过模仿而传递。凡勃伦观察到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的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是社会选择的基本单位，“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过程”^⑥。纳尔逊和温特在其名著中，讨论了类似基因的企业惯例的作用：它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但他们又认为，惯例并不是新达尔文主义意义上的基因，其突变（他们称之为创新）是有目的的而非随机的，获得的新惯例是“可以遗传的”。自此之后，普遍被接受的想法是：生物演化是达尔文的，而社会经济演化则是拉马克的。但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则一直悬而未决，霍奇逊和克努德森(Knudsen,T)的最新研究^⑦解决了这个问题：后者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也是达尔文的。

第二，变异或新奇创生机制。有目的地创造新奇和多样性是

人类社会演化最重要的特征，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就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的问题。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这个问题而言，凡勃伦指出，新奇创造是闲散好奇心和操作本能的结果。威特认为，有两个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一是经历新奇的快乐和刺激，另一个是挫折推动着对新奇或变异的搜寻。综合奥地利学派和老制度学派的观点，笔者认为，就新奇创造而言，它取决于两个因素：个体认知模式的不同和社会制度是否鼓励创新，前者来自于个体偏好或知识的主观性质（这是奥地利学派研究的重点），而后者是“流行的思想习惯”（即感觉和思想所共享的范畴，老制度学派研究的重点），所有这两个方面都需要一种知识理论。在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演化大纲中，知识就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4]。目前，演化经济学的不同研究传统在新奇创生的方式上已取得了一致性的看法：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新组合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主要地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看做了什么，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们无法明确地预见到那种新奇将创生，但我们仍有可能从正在发生的事情中排除某些结果或行动的进程，哈耶克认为，这是一个可检验的假说。

第三，选择机制。选择机制所研究的是变异或新奇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我们这里用制度选择来说明这个问题。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因此，变异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式的出现，它在经济系统中是如何扩散的？演化经济学采用进化生物学的个体群观念对此加以解释。“从个体群层次来看，任何个体的决策，无论是创新、模仿或保守的，都影响到个体群中全部行为的相对频率”^[5]，这就是威特的“频率依赖效应”：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

还是反对，依赖于群体中有多少成员已做了这种选择。不管创新者主观偏好如何，竞争过程将对其进行选择。报酬递增（正反馈或自增强）作为“频率依赖效应”的一种重要特性近年来得到了更多的讨论。在创新扩散的初始阶段，旧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就有可能将创新扼杀在摇篮之中，但如果系统是开放和远离均衡的，由于自增强的作用，创新就会通过系统的涨落被放大，从而使之越过某个不稳定的阈值而进入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当新结构形成后，自增强机制将使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式进入快速扩散阶段，最后演变成社会流行的状态，这就是凡勃伦有关思维和行为习惯的惯例化过程。

第二节 起源与发展概况

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演化这个术语和生物学类比在经济学界是非常流行的，以至于马歇尔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2]，凡勃伦广泛地利用了达尔文的思想，试图转变经济学的基础，并创建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初，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为首的老制度主义是美国的主流学派。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和社会思潮已不利于老制度主义的生存。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声名狼藉，演化主义（evolutionism）坠入了发展的“黑暗时代（1910-1940）”，正如桑德森（Sanderson）所指出的，“在这个时期，演化主义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它被看做是过时的方法，……甚至使用‘演化’这个词也要冒声誉受到严重损害的风险”^[3]。

20世纪四十年代，随着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兴起，经济学数学化的趋势日益加剧，老制度主义的命运岌岌可危，演化经济学在这个时期进入了沉寂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种趋势

被逆转，演化思想开始在社会科学中复兴。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忽视演化经济学先驱的情况下，著名经济学家阿尔钦、罗金、纳尔逊和温特等对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现代演化经济学开始起飞。1981年，博尔丁出版了《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目前已成经典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据霍奇逊引用的统计数据，该书的年引用数1992年已达119次。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现代演化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视野和范围都被大大地拓展了，现在已有许多新老不同的研究传统聚集在演化经济学的旗帜之下。

一、老制度主义

演化经济学这个术语最早是由凡勃伦在1898年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中提出的，在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眼中，制度经济学就等价于演化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一般也倾向把演化经济学等同于凡勃伦传统的老制度学派²³。20世纪60年代，老制度主义首先在美国得到复苏。1965年，美国老制度主义者成立演化经济学学会，1967年开始出版会刊《经济问题杂志》，从1970年开始颁发“凡勃伦—康芒斯奖”。当时，加尔布雷思和格鲁奇就以美国老制度主义者而闻名。20世纪70年代，经过萨缪斯和图尔（Tool, M. R.）的努力，老制度主义明显地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和艾尔斯（Ayres, C.）的著作陆续被重印。2001年，布什（Bush, P. D.）和图尔系统地总结了美国老制度主义的经济演化原理。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老制度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势头比美国更为强劲。1988年，欧洲老制度主义者成立了由霍奇逊任秘书长的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目前，这个协会已成为具有广泛基础和多元化的论坛。除了美国老制度主义的影响外，欧洲老制度主义者还继承了缪尔达尔、卡普（Kapp, W.）和波拉尼（Polanyi, K.）这些欧洲老制度主义先驱者的遗产。此外，马克思和德国历史

学派的遗产目前也开始对欧洲老制度主义的发展产生影响。2002年，霍奇逊系统地总结了欧洲老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原理²³。老制度主义传统在美国和欧洲的进一步发展将来有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差别，但从总体上来看，它不仅与新制度学派在研究纲领上是相当不同的，而且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提出了后者在新研究方向上所设定的问题²⁴，我国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对此加以注意。

二、“新熊彼特”学派

在演化经济学的复苏或现代发展中，熊彼特成为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继承其传统的经济学家自称为“新熊彼特”学派。在经济学说史上，由于熊彼特强烈地反对把他的理论看做是达尔文的，反对生物学类比，所以经济学家们对熊彼特在多大程度上是演化经济学家曾经发生过争论。争论的结论是：新奇而非生物学类比是判断演化经济学的核心标志。在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中，新奇是重要的本体论预设，他把创新看做是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强调了非均衡和质变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突出了企业家和技术创新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所以，熊彼特是不使用生物学类比的演化经济学家。

然而，“新熊彼特”学派经济学家们发现，演化框架非常适合于对熊彼特的主题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广泛地使用了生物学类比。正如纳尔逊和温特所指出的，“‘新熊彼特的’这一名词是我们整个分析方法的适当名称，正像‘演化的’一词一样适当。为了成为‘新熊彼特’学派，我们才成为演化的理论家，因为演化的思想为我们详细说明和正规表述熊彼特看法提供了一种可以工作的分析方法”²⁵。

“新熊彼特”学派批判地继承熊彼特的传统，广泛地探讨了“熊彼特竞争”的各种问题，如创新收益率、竞争的可持续性、企业规模分布、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和新企业创办的作用等；提出了技术推动和技术、制度与产业结构共演的演化增长理论；发展了

目前对企业战略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能力理论；并以研究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创新体系等闻名于世，如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的著名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就是该组织“国家创新体系研究项目”的子报告。该学派1986年成立国际熊彼特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颁发“熊彼特奖”并出版会议论文集，并于1991年创办《演化经济学杂志》。目前，“新熊彼特”在研究风格上已形成了两种相当不同的分支文献：更形式化建模的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和经验性研究的创新体系理论，后者的形成还受到德国历史学派和老制度学派重要的影响。

三、奥地利经济学

一般认为，奥地利学派是由19世纪末著名的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所开创，但正如葛劳蕊（Gloria）的最新研究所指出的，对奥地利学派的传统理解忽视了门格尔的独创性贡献。葛劳蕊认为，门格尔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复杂经济现象的起源和演化的理解，即对经济制度结构的理解。正如门格尔自己所指出的，理论经济学对最重要问题的解答密切地与理论上对“有机地”创造的社会结构的起源和变化的理解这个问题有关^⑤。霍奇逊认为，门格尔之所以被看做是经济演化思想的先驱，就是因为他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性质，经典例子之一是门格尔有关货币从物物交换经济中有机和自发地演化出来的理论。如果按照葛劳蕊的上述理解，庞巴维克和维塞尔虽然自称为门格尔的传人，但实际上他们忽视和背离了门格尔的遗产。只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我们才能在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作中看到奥地利学派原创意识的重现，它最终在70年代导致了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复兴，产生了柯兹纳和拉赫曼（Lachmann）等重要代表人物。现代奥地利学派还包括英国的罗斯彼（Loasby, B.J.）和德国的威特等著名演化经济学家。

奥地利学派一直是新古典理性经济人这个基本假定的批判者，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假定所有的个体对同一问题会有同样的感受，



尤其是企业家在发现常人不能看到的机会上具有独创性。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上，预期和想像力至关重要。该学派突出地强调了主观知识对新奇的重要性。自哈耶克以降，该学派存在着一个相对统一的基础，即市场作为过程的概念。

奥地利经济学对演化经济学的贡献也主要集中在市场过程的演化理论方面，这包括奥地利经济学家对市场过程不同层面的解释。第一，罗斯彼发展了一种对个体如何获取和使用知识的心理学的理解。对演化经济学家来说，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被看做是由经济行为者自身所产生的，因此学习必须被假定为不同质的，它导致了新奇思想的产生、知识的创造和扩展，人类能在主观想像中创造并扩展可供选择的集合。第二，市场不只是作为对分散的信息进行加工的工具，而且也是产生新奇并对其检验的制度，哈耶克对此已做了大量的阐释。第三，新奇的突现及其通过市场的扩散总有资源配置的结果，这召唤着协调理论的再概念化。由于新奇创生的不断突现，威特认为，协调与脱协调(de-coordinating)的活动常常同时并存，共同形成了可观察的市场过程，它导致了“非均衡态”的永存^④。

四、法国调节学派

在演化经济学领域中，人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法国“调节”学派(The regulation school)也自称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流派。1998年，杰索普(Bob Jessop)在一篇回顾性质的论文中，开篇就指出，“大约20年间，在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复苏中，更一般地在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调节方法得到了喝彩”^⑤。作为演化经济学中较少被注意到的流派，调节学派对制度多样性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化深有研究。笔者认为，多样性是变异和新奇突现非常重要的条件，这是该学派隐含的假定。作为发端于法国巴黎的学派，其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布罗代尔的年鉴学派，它虽然与“结构马克思主义”一样强调作为社会结构的制度的重

要性，但拒绝后者对经济行为者能动性的忽视。

“调节(regulation)”这个概念在法语中更接近于系统论的含义，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或过程在某种条件下交互调整从而产生某些有序的动态。正如杰索普指出的，“调节”这个动态概念强调了在与资本主义不稳定变化的客观需要相适应的特定条件下，历史上因事而变的经济和非经济机制交互作用导致了经济行为者所采取的行动。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取决于相当特定的制度实践，但这些制度的共存与连贯性不能被视做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偶然事件、有意识的社会行动以及在生产者背后起作用的经济趋势等因素多样化结合的结果。资本主义再生产是因事而变和不确定的，只有某种能够容纳其内部冲突和矛盾的调节模式才能使之成为可能。调节模式则是使资本积累结构得以稳定的习俗、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和行为形式的突现性结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调节学派最著名的工作就是运用其框架对美欧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进行了分析，它对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如经济地理学和社会学等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从系统动力学到“复杂系统理论”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数学工具的匮乏和形式化建模的缺乏是早期演化经济学不能成为主流的重要原因。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非线性动力学和计算机模拟的发展已使这种状况大为改观，它在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在经济学中，可以归类为“演化的”数学模型除了展示动态行为的不同类型外，还能对某种形式的非均衡进行建模，它们拥有路径依赖、自组织、多重均衡和混沌行为这四个方面的一个或多个特征²⁶。

在演化经济学建模的发展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桑塔费研究所。1987年9月，桑塔费研究所首先大胆地尝试把物理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等统一起来，发展一种跨学科的复杂系统理论²⁷。桑塔费经济学除了包括上述系统动力学的建模外，还给经济学的工具



箱添加了遗传算法 (genetic algorithms) 的新工具, 导致了“人工经济学 (artificial economics)”的发展。

近十几年来, 演化经济学的建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神经网络、合作博弈的实验经济学以及应用于多层次空间系统的图论模型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种趋势的发展最近还导致了一些经济学家模仿生物物理学, 通过移植物理学 (特别是统计物理学) 的方法, 致力于建立一种称做“经济物理学 (econophysics)”的新经验科学。2000年, 曼蒂格纳 (Mantegna) 和斯坦利 (Stanley) 出版了经济物理学的第一本教科书³⁹, 同年, 经济物理学的研究者以“金融波动的经验科学”为题在东京组织了国际专题讨论会。

六、演化博弈论

演化博弈论首先出现在进化生物学中, 其关键性概念是进化稳定策略, 它是由梅纳德·史密斯和普赖斯在1973年引入, 并由史密斯在1982年有影响的著作《演化与博弈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经济学中, 演化博弈论的发展起源于传统博弈论所遭遇的困难。20世纪80年代, 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把演化博弈论引入到经济学中, 但博弈论研究的主流对纳什均衡的讨论仍是基于完全理性和共同知识的假定, 这种假定能保证在持有对其他博弈参与人如何行动的信念的条件下, 每位博弈参与人能做出最佳反应, 但无法保证这种信念的正确, 在较为复杂的情况下, 这必然会导致纳什均衡的不可行。因此,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博弈论研究的重点已转向了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演化博弈论。

相对于纳什均衡, 进化稳定策略把均衡看做是调整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某种突然出现的東西, 所以, 它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博弈过程动态化, 但关注的焦点仍是均衡选择。正如萨缪尔森指出的, 非均衡是短暂的, 均衡行为才是持久的, 对后者的研究可以为前者提供认识, 演化模型比完全理性模型为纳什均衡提供了更强有

力的成因^②。

在经济演化博弈论中，博弈参与人能够通过模仿、试错和学习过程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策略，博弈分析的核心不再是博弈参与人的最优策略选择，而是基于有限理性假设对博弈群体成员间的策略调整和受到干扰后重新恢复稳定均衡的探讨。这种方法已被裴顿·杨(Young, P.)^③、青木昌彦和博迪(Body, R.)^④等运用于习俗、惯例和经济体制演化的分析。

第三节 重大前沿理论问题

经过20年的发展，现代演化经济学已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化格局。与一个世纪以前演化经济学创始时的情景相比，经济演化思想的再度流行不仅已使老制度主义和奥地利经济学这些既有的传统重获生机，而且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传统。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演化范式不仅已渗透到并已在经济学各个领域和管理学中得到了重大的扩展，而且它在经济学中已成为跨学科和交叉学科最重要的领域。

但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仍是很不成熟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新奇为核心的研究纲领和哲学基础并未得到更深入的探讨；各种研究传统不仅缺乏更完善和统一程度更高的研究框架，而且还存在着较大的冲突；它还没有形成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抗衡的系统的微宏观理论体系。这些问题的解决已成为演化经济学的前沿，它对于演化经济学将来能否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世纪之交，许多演化经济学家已对这些前沿问题做出积极的反应，如福斯特和梅特卡夫在《演化经济学的前沿》这本书的导



言中指出，演化经济学家们已不再把精力放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上，而是思考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个可以辨别出的关键性发展就是研究的焦点已从传统上对选择机制的关注转移到新奇和变异如何为这种机制提供动力。又如，波茨（Potts）2000年出版并于当年获“熊彼特奖”的《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一文，试图为异端经济学的所有传统或流派提供统一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基础等等。从演化经济学总的发展趋势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四个重大的前沿问题。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部将分化为两大阵营

近几年来，随着复杂系统理论和演化博弈论的发展，演化经济学在数学建模方面的文献急剧增加。例如，桑塔费研究所的第二本论文集³⁵都是数学模型的文章，日本演化经济学协会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几乎也都是数学模型³⁶。这种发展趋势招致了现代演化经济学开拓者纳尔逊的批评。纳尔逊在最近发表的几篇论文中都多次强调，他和温特等所发展起来的经济演化理论与演化博弈论和复杂系统理论是相当不同的。纳尔逊指出，均衡仍是演化博弈论的关键性假设，他们对偏离均衡的研究主要是作为理解均衡态的工具；而我们却对任何稳定态不感兴趣，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状态之中的非均衡是我们的基本假定。纳尔逊认为，复杂系统理论虽是动态的，但它和演化博弈论一样，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数学建模，很少关心经验事实。

演化经济学家们对数学的作用一直就存在着争议。一些人把数学形式化看做是演化经济学成为主流的主要途径，在今天看来，这似乎是唯一的途径。但是，正如威特所指出的，这些人当中仍未有一人发现，甚至考虑一下新奇的创生怎样可以在数学形式化中适当地被处理。对于那些深刻地理解了新奇这个本体论假设的演化经济学家来说，数学的作用是非常令人怀疑的，霍奇逊就对经济学中的数学化趋向不断地提出批评。在演化经济学的其他四

种研究传统中，除了“新熊彼特”容忍演化经济学在数学模型上的发展外，老制度主义、奥地利经济学和“调节”学派都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在这四种研究传统占统治地位的方法或者是历史的、制度的和比较的，或者是解释学的。

目前，已有许多迹象表明，在演化经济学未来的发展中，这种对数学看法的分歧将会扩大，从而使众多研究传统分化为两大阵营。

二、演化经济学面临创造性的综合

自1989年以来，西方演化经济学家们已对老制度主义、奥地利经济学、“新熊彼特”和“调节”学派这四大研究传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分别进行了探讨。萨缪斯等在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比较了奥地利经济学和老制度主义的异同；对新古典经济学均衡概念和最优假定的拒绝以及对复杂社会经济系统演化过程的关注使他们具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他们之间的差别没有必要是不相容和不可通约的³⁹。在“调节学派”与老制度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奥哈诺把马克思与凡勃伦视做制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奠基者，并广泛探讨了这两大传统在当代发展的内在联系⁴⁰。在多西和科里特(Coriat)合写的一篇论文中，他们对“新熊彼特”与“调节”学派之间的“联系、重叠、冲突和可能的杂文”⁴¹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就“新熊彼特”和老制度主义的关系而言，在纳尔逊和温特的经典著作中，他们忽视了凡勃伦的重要贡献，但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纳尔逊和温特把企业惯例视做基因类比物实际上是凡勃伦创见的再发现。后来，他们补救了这个失误，以至于纳尔逊在1996年的一封私人通信中写道，我现在才充分理解了我属于老制度经济学。因此，纳尔逊近年来一直在强调，通过惯例这个相一致的概念把制度引入到（“新熊彼特”的）经济演化理论之中⁴²。2002年12月在法国里昂召开的“制度主义与演化经济学”国际会议就是对纳尔逊这种倡议的反应。

目前,西方演化经济学家尚未明确提出创造性综合的任务。但笔者认为,在过去的20年间,演化经济学强有力的复苏已积累了大量的文献,系统地整理演化经济学已有成果的时机现已成熟。特别是老制度主义、奥地利经济学、“新熊彼特”和“调节”学派所承继的传统已发生了很大的嬗变,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这就为我们的创造性综合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而目前的这四大研究传统基本上仍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着,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片面性,如果能在新的框架下相互杂交,这将有可能在理论上产生重大的创新⁴¹,本书第六章将讨论这个问题。正如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创建者的工作经由马歇尔之手加以整理、精练和综合使其以较完备的形态而出现一样,这项工作对于建立一个更完善和统一程度更高的研究纲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也是创建演化微观经济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三、演化分析框架:达尔文主义还是自组织理论

对于经济演化的分析基础来说,拓展达尔文主义框架,还是用自组织理论取而代之?这是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虽然彭罗丝早在1952年就对经济学中的生物学类比提出了批评,但达尔文主义一直是演化分析的基本框架。最近,福斯特和威特对此又提出了挑战。福斯特⁴²认为,生物学类比,无论是达尔文的还是拉马克的,其主要缺陷是非历史的,它也没有考虑到人类社会独特的创造和合作行为。对此,霍奇逊反驳道⁴³,福斯特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许多生物学家强调了生物演化的历史特征,现代生物学在动物合作和无私行为方面也提供了大量的文献,福斯特所依据的是现代生物学被看做是非常有问题的粗糙的版本。威特对生物学类比作为演化经济学发展的基础也表示怀疑,但他又认为,达尔文主义可以通过直接而非隐喻性的应用成为演化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即用于解释人类偏好的生物学演化。福斯特和威特都不约而同地提出用自组织理论替代达尔文主义,

在他们看来，“自组织理论……为演化过程提供了一种抽象的和一般的描述”⁹⁸。果真是如此吗？

自组织理论首先是在非平衡热力学中由普利高津等发展起来的，布洛克(Brook, D.)和威利(Wiley, E.)等⁹⁹试图通过结合熵定理等热力学见解把演化理论一般化。导致这种发展的背景是，1961年，雅各布和莫诺展示了基因库中的大部分秩序是遗传排列自组织的结果，这是20世纪40年代所产生的新达尔文主义框架未能容纳的，因为后者把生物个体之间的生存斗争看做是演化的主要原因，忽视了自然选择的基础——基因变异的自组织。1993年，考夫曼强有力地论证了自然选择不能单独地解释复杂有机体的起源。然而，与福斯特的看法相反，霍奇逊指出，这些现代作者并没有把他们的论点看做是对达尔文理论的替代，这里所涉及的只是对自然选择理论的修正而非否定。霍奇逊认为，自组织是演化过程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不能替代自然选择。现在，福斯特已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不再否认所有的生物学类比，而是更多地抱怨这种类比的陈旧。他写道，因为进化生物学本身已把自组织作为演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类比性的思考必须考虑它对经济演化理论的意义，一个统一的“新熊彼特”模型必须处理经济的自组织和经济的竞争选择¹⁰⁰。

总的来说，这场争论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不仅使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已从选择机制转移到变异和新奇创生的自组织机制上，而且，一种共识已达成：演化解对经济学不是类比，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方案。霍奇逊进一步指出，达尔文主义具有独立于其应用领域的内在逻辑，它为多层级的演化过程提供了一般框架。因此，演化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纳入自组织理论的达尔文主义，而且要在其原理指导下，发展更具有特定性和更详细的经济演化理论，这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四、批判实在论与演化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是超验实在论(transcendental Realism)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中的特称,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成熟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已对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形成了最强有力的挑战。福斯^[1]最早敦促演化经济学家们加强对批判实在论与演化经济学内在联系的研究,这种看法得到了弗罗门和霍奇金的赞同,这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正如弗利特伍德(Fleetwood, S.)^[2]指出的,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的发展利用了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特别是巴斯卡(Bhaskar)的著作,但它深深地根植于异端经济学之中。在提供一种对新古典经济学哲学基础进行替代的选择时,它批判性地利用了凡勃伦、康芒斯、马克思、门格尔、熊彼特和哈耶克等人的著作。弗利特伍德认为,批判实在论已使演化经济学先驱者的思想系统化了,有时批判性地对之进行了改造。

批判实在论有可能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以下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首先,批判实在论能否成为演化经济学创造性综合的基础,其社会经济本体论将如何化解奥地利经济学的个体主义与老制度学派等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冲突;其次,如何以批判实在论为指导,系统地整理演化经济学在企业、产业组织、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等许多方面的具体理论;第三,如何利用批判实在论完善以新奇为核心的研究纲领,协调它与达尔文主义的关系;最后,如何通过批判实在论推动复杂系统理论的发展。沃林(Wollin, D.)认为,批判实在论为复杂系统理论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并简要地讨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方面,有大量的问题仍未被探索。



第四节 本书计划

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目前正处于关键时期，本书的写作持有鲜明的立场，反映了作者对演化经济学未来发展的看法。作者认为，演化经济学作为研究复杂经济系统的科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必须反对“科学主义”的泛滥。因此，作为导论的最后一节，我们讨论演化经济学重大前沿问题的第一个：反对数学在演化经济学中的泛滥。本节首先介绍艾伦（Allen, P.M）对演化复杂系统研究方法的讨论，然后对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¹⁰提出批评，最后指出本书致力于发展反对数学形式化的演化经济学，集中在重大的前沿问题。

一、艾伦论演化复杂系统的研究方法¹¹

福斯特和梅特卡夫(Metcalf, J. S.)在《演化经济学的前沿》的导言中写道，过去的20年中，在复杂的经济适应系统建模方法的研究上，艾伦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很多时候演化经济学家们对艾伦突破性的贡献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系统理论之间缺乏密切交流所造成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两者的交汇才成为潮流，梅特卡夫和波茨(Potts)等所谓“新演化经济学”就体现了这一点。实际上，从广义上来说，演化经济学是复杂系统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先驱之一，而复杂系统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演化，艾伦的研究对澄清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艾伦有关复杂的经济适应系统建模方法的研究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人类为了认识世界，获取知识，就必须通过某些简化的假定，把复杂的现象转变成较简单的和可理解的状态。获取知识就等于知道可以做出什么样的简化。为了认识世界，简化是必不可少的，但怎样的简化才不会损害描述的现实性呢？在简化和现实

性之间存在着替代或权衡吗？艾伦对简化的假定做了以下四种区分。（1）在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确定一种边界。换言之，我们首先要假定存在着一种“系统”和一种“环境”，我们可以在系统组分的基础上理解系统的运转，在环境的脉络中理解系统的运转。（2）对系统的组分进行合理的分类，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分类的规则完全是直觉地做出的。事实上，我们刚开始总是作某些质的研究，试图确认我们认为重要的特点，然后把我们对系统的理解与我们碰到的现实加以比较。（3）在任何系统组分的亚系统中，所有要素或者是被假定为同一的，或者是假定为围绕平均值正态分布上呈现多样性。（4）假定系统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用不同事件或要素特征的平均值适当地来描述。

艾伦指出，对这四个假定采纳程度的不同产生了四种不同的研究或建模方法。

首先，均衡方法。均衡方法采纳了所有这四个假定，并做出第五个假定：系统必然地趋向均衡和稳定。为了对均衡假定提供正当的理由，某些极端的实践者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声称人们可以完善地预期到每个人将做什么，因此甚至更快地把系统带到均衡。这种研究方法假设了系统的变量之间具有固定的关系，他们对现实的研究是通过一套联立方程来求解的，其中每一变量值都是用其他变量值的函数来表示。均衡假定的优势是在简单方面，因为它只考虑了联立方程而没有考虑动力学方程。它也提供了按照决策前后的静态考察决策和政策的可能性（比较静态），所有成本—收益分析都是基于这种有缺陷的思想。这种方法的典型代表是新古典经济学。

其次，非线性动力学。采纳所有这四个假定产生了系统动力学，它是对变化的一种机械式描述。由于它假定系统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用不同事件或要素特征的平均值来描述，所以，由非线性动力方程所追踪的轨迹不是真实系统中实际的事件进程，而是这

种系统最可能的轨迹。而且，变量的平均值假定产生了美丽的平滑轨迹，其结果是所有事件完全被初始条件所决定，系统行为是完全可预测的。由于非线性，系统的长期行为具有三种不同的可能：多重均衡、不同的周期解和混沌运动。

再次，自组织动力学。从假定（1）到假定（3）产生了自组织动力学的模型。在这种情况下，变量的非平均类波动在描述中被保留了，系综（ensemble）可以抓住系统所有可能的轨道。这种更丰富、更一般的模型允许系统运转时产生自发的集群和空间形态的自组织，在普利高津等原创性的工作中，这又被称做“通过涨落产生有序”。自组织是真正的非线性系统的自然特征，它赋予系统一种使其结构产生自发空间重组的集体适应行为，它探索了任何现存形态的稳定性，当不稳定发生时，系统就产生了新结构的突现，非线性动力学只是因为假定（4）才丧失了这些特点。

最后，演化复杂系统。只做出假定（1）和（2），就把演化与自组织区分开来了。假定（3）即要素围绕着平均值呈现出正态分布的多样性并不是真正的多样性，因为它仍对现实创造了一种“以原型”为基础的简化（类型学的思考），这使自组织动力学不能展示系统内演化和学习的动力。实际上，个体行为的多样性是系统的局部动力学的结果，行为密切地与个体拥有的知识有关，这反过来取决于知识传递的机制。由于个体知识的差异和传递的不完善性，系统就存在着对行为空间的探索。个体行为的微观多样性允许非平均类的和古怪类的探索，这是创新的重要基础。正如艾伦指出的，如果古怪类行为总是被压制，就不会有演化，如果不是这样，适应和新的行为将发生。隔离（局部动力学的基础。见本书第三章）和正反馈机制在创新和演化中起着重要作用。

根据艾伦的上述研究，笔者认为，简化和现实性之间存在着替代或权衡。对演化问题富有成效的研究不会来自非常严格的假定，历史的、比较的和阐释的方法对认识社会和制定政策具有更

大的相关性，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在上述四种研究方法中，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方法代表着“最少的”科学内容，但它却最流行，对政府制定政策影响最大。相反，演化经济学的各流派长期以来被边缘化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把数学看做是判断一项研究是否是科学的标志。这是完全错误的。演化经济学在21世纪如果要取得富有成效的发展，我们就必须打破这种“科学”的神话。

二、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皇帝的新衣

记得1995年，我在国家图书馆浏览经济学英文杂志时，得到最深的印象是：只有为数相当少的杂志使用数学不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而大多数杂志几乎绝大多数论文都充斥着数学公式。对于这种状况，我当时怀着比较复杂的心情：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实在是江郎才尽，没有理论创新，惟有用数学来充数，这不就为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后来居上提供了机遇吗？忧的是数学在西方经济学界被过分推崇毕竟不是好事，它无疑要阻碍经济科学的发展。

但自那时以来，喜的心情渐渐消退，而忧虑日渐加重。因为我经常听到有学生对我讲，我想从事经济学研究，但我的数学不是很好。我对他们解释，数学好坏没有关系，但他们大多仍然是将信将疑。我参加博士生新生入学见面会时曾得到的一种印象很能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毒害是多么严重。我系见面会的第二项照例是新生自我介绍，当有学生自我介绍曾毕业于数学系，有许多同学投去肃然起敬的目光，甚至有的发出赞叹的声音。但我指导研究生的经验告诉我，理工科毕业的学生指导起来困难得多，就发现对经济学有天分的学生来说，理工科毕业的学生和经济学系毕业的学生比较起来，前者的比例要明显低于后者。毕竟大学本科教育是很重要的，经济学系毕业的学生经历了4年的耳濡目染，这种熏陶在研究生阶段是无法再获得了。有人可能会说，你的经

验是片面的。可能是吧。最近，我所指导的一位硕士生从美国回来，谈起数学的重要性，他告诉我，在美国，博士毕业论文如果没有使用数学模型，论文的质量就被认为不高，甚至不可能通过答辩。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霍奇逊写道，“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用词语表述的占到90%以上。但到20世纪90年代，在主要的和历史悠久的杂志上90%的文章是由代数、微积分和计量经济学所支配”³⁸，20世纪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胜利对经济学的发展实在是一场灾难，但我们能够阻挡它在中国的蔓延势头吗？

笔者并不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但反对它在经济学中的泛滥。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然而奇怪的是，学经济学的学生无须具备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的大量知识，但必须“精通”数学。数学在经济学中果真这么重要吗？非也。杰奥尔杰斯库-罗金指出³⁹，对经济学来说，数学模型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是有用的。第一，在工程经济学中，已知价格和生产系数，试图求出最优解，这处理的是约束条件，最好的例子是线性规划。第二，对于推理来说只作为一种明喻，但我们首先必须具有某种推理，如果忽视了这个条件，我们就陷入了无用的数学游戏。经济理论的创新总是先于词语或数学的表述，杰奥尔杰斯库-罗金写道，正如许多著名的数学家认为的，数学的任一分支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在数学发展史上精确的新奇是一种“新”定理的发现行为，而不是定理本身，同样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不会反映使用者的学术水平。霍奇逊也指出，数学是有用的，它的发现是富有创造力的，但它的应用只涉及逻辑的演绎推理，而不是理论上真正的新奇。在例外的情况下，数学能鼓励理论的变化，如博弈论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西蒙“有限理性”概念的更广泛的接受。然而，这个概念的创造本身不是来自数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把注



注意力集中在推理的形式化链条上，而不是隐含的范畴和基本假定上，鼓励了理论上的保守主义而不是创新⁵⁵。总而言之，数学在经济学中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论证工具起到作用，经济理论的创新丝毫不会来自数学的应用，但为什么非要把它作为判断研究水平高低的标准呢？

根源就在于许多人把数学看做是真理的化身。数学应用程度并不是衡量某门学科科学程度的标准，因为数学本身并不是真理的化身，它只不过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它显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根源和力量，但正如其他知识体系一样，数学本身同样显示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在经济学中，如果把数学作为判断研究水平的标准，实际上就把我们人类人为创造的产物作为真理的化身了，这确实是在哈耶克意义上的另一种形式的“致命的自负”。经济学家们实在有必要去读读数学史方面的著作，在这方面，美国数学家和数学史家克莱因的著作《数学：确定性的丧失》就是一副很好的解毒药。正如经济学一样，数学的发展过程同样充满着矛盾、混乱和冲突。克莱因写道，“现有的关于数学自身本质的各种矛盾以及今日数学不再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无可辩驳的知识体系，这一事实毫无疑问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数学是人为的”，数学“是一个人为的构造，任何为其寻求绝对基础的尝试注定是要失败的”。“数学处理的是物理世界中最简单的概念与现象，它的研究对象不是人而是无生命的物质，它的行为是重复性的因而数学可以描述，但在经济学、政治理论、心理学以及生物学领域，数学就无能为力了”，然而，“在给予宗教、社会科学和哲学全部应有的尊重，而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数学并不处理我们生活的这些方面的情况下，数学在给予我们知识方面仍然取得了不可限量的成功”⁵⁶。

简言之，既然数学只是一种工具，那么，数学水平的高低和使用数学与否丝毫不会影响经济学研究的水平，更不会阻碍一个

人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我国经济学界为了改变经济学教育水平落后的状况，把数学的应用看成是最重要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数学作为我国经济学教育的“皇帝的新衣”得到了盲目的推崇。

三、本书致力于发展反数学化的演化经济学

笔者认为，对于研究复杂的经济现象来说，数学建模不但不是高级的工具，反而是过于简单的方法。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对于一位富有创造力的经济学家来说，在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方面具有丰富的知识要远比拥有数学知识重要得多。特别是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数学模型根本就无法处理新奇在经济变化中所起的作用，杰奥尔杰斯库-罗金对此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证。

罗金指出，经济过程最重要的方面恰恰就在于新奇的持续突现。新奇是不可预测的，每种新奇按其年月顺序只发生一次，这在时间意义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总是代表着一种质的变化。因此，数学模型不能处理新奇的创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从数学模型中得到的东西只能涉及量的变化，并且从数学模型中得到的结论已包含在其假定之中了。此外，与清晰和确定无误的数的概念不同，社会科学中的概念与范畴具有重叠与交叉的特征，且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如“民主”和“人的需要”这些概念在不同国家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使得数学方法无能为力。因而，对于研究新奇的创生和结构变迁来说，“除了使用辩证法，我们没有别的解决办法。这意味着使用词语而不是数目字，因为真正的质变不可能通过算术模型来阐述。就其特定性质来说，质的特性不是像数目字那样预先被注定。历史最相关的部分是用词句所讲述的故事，甚至当它由时间序列相伴随之时，……我们的学科必须在更大程度上面向由马克思、熊彼特和其他几位不太著名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那种‘模糊和印象主义’的研究”³⁵。因此，罗金特别推崇马克思的辩证法，赞同经济学研究

使用历史的和制度的方法。

本书反对演化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按照这种总的指导思想，随后几章交围绕演化经济学其他重大的前沿问题安排体系结构。我们首先介绍和评价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彻底批判的自称为科学哲学“哥白尼革命”的批判实在论，然后讨论作为演化经济学基础的达尔文主义。在此基础上，第四章和第五章对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进行了研究。第六章讨论演化经济学的未来。2002年11月，在开始撰与本章时，笔者在互联网上偶然进入 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 的网站 <http://www.paecon.net/>，得知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霸权地位质疑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已经兴起，这无疑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大的推动力。笔者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都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应废除的是任一种经济学的霸权地位，创造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格局，对中国年轻一代经济学家来说，对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进行创造性的综合，这是21世纪上半叶我们值得奋斗的目标。本书第七章研究了《周易》中的演化思想，并初步探讨了在演化经济学中创建“脉象”学派的可能性。最后一章则运用演化经济学原理，论述了后发优势的经济演化理论。笔者认为，在后发优势的问题上，演化经济学比新古典和新制度主流经济学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其进一步呼唤着脉象学派的理论创新。

注释：

①在许多人的眼中，所谓现代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或异端经济学各流派是不能算做“现代的”，这种话语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霸权地位的写照。

②多西和纳尔逊1994年对演化经济学的评述基本上就是针对“新熊彼特”

学派的，参看 Dosi, G. and Nelson, R., *An Introduction to Evolutionary Theorie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994, 4。

③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2)，2页。

④Witt, U.,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 Interpretative Survey*, In: Dopfer, K. (e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Program and Scop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p.49.

⑤演化经济学“是对现存结构的转变和新奇创生与可能传播的调查”，见 Foss, N.J., *Real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Journal of Social and Evolutionary Systems*, vol.17, no.1, 1994, p.21.

⑥Vromen, J. J., “Evolutionary Economics: Precursors, Paradigmatic Propositions, Puzzles and Prospects”，in Reijnders, J. (ed),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7, pp.54-55.

⑦Witt, U., *Evolution as the Theme of a new Heterodoxy in Economics*, in Witt, U. (ed) *Explaining Process and Change: Approaches to Evolutionary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p.3.

⑧Witt, U.,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 Interpretative Survey*, In: Dopfer, K. (e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Program and Scop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p.52.

⑨中国人民大学的孟捷教授在阅读本章书稿后向笔者指出，“Population Thinking”在日文中译做“个体群思考”。他认为这个译法较好地体现了原意，我同意他的看法，并认为这个译法比较传神，故欣然采用，并特此致谢。

⑩它的起源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但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者对其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见拙著《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第204-20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⑪Magnusson, L and Ottosson, J. (eds)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Path Dependenc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7, p.3.

⑫参看 Mirowski, P. 的相关论著，如 *Against Mechanism: Protecting Economics from Science*,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88.

⑬Hodgson, C. M., *Economics and Biolog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5, xiii.

⑭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第6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⑮目前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争议。我们将在前沿问题中对此加以评论。

⑩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97。

⑪Laurent, J., and Nightingale J. (eds.) *Darwin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1.

⑫“演化经济理论研究的困难主要是由于他们试图解释经济体系中所应用的知识的内生转变”，见 Andersen, E. S., *Evolutionary Economics: Post-Schumpeterian contributions*, Pinter Publishers Ltd., 1994, p.13.

⑬Witt, U., *Evolutionary Economics: Some Principles*, in Witt, U. (ed) *Evolution in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Physica-Verlag Heidelberg, 1993, p.5.

⑭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三卷，18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⑮Hodgson, G. M. (ed) *The Foundation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890—1973*, Edward Elgar, 1998, X vii. 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史可参看 Hodgson, G. M.,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Polity Press, 1993.

⑯Foster, J. and Metcalfe, J. S. (eds.) *Frontier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Edward Elgar, 2001, p.1.

⑰Hodgson, G. M. (ed) *A Modern Reader in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Key Concept*, Edward Elgar, 2002, xviii—xxiv.

⑱贾根良：《重新认识旧制度学派的理论价值》，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4）；《制度变迁理论：凡勃伦传统与诺斯》，载《经济学家》，1999（5）。

⑲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47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⑳Gloria, S., *The Evolution of Austrian Economics: From Menger to Lachmann*, London: Routledge, 1999, p.14, p.16.

㉑Witt, U., (e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Edward Elgar, 1993, xviii—xxi.

㉒Jessop, B., *Twenty Years of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Sociology Department, Lancaster University, 2001. Source: <http://www.lancs.ac.uk/sociology.com>.

㉓Radzioki, M. J. and Sterman, J.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System Dynamics*, in England, R.W. (ed) *Evolutionary Concepts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64.

㉔沃尔德罗普对这些科学家如何开创“21世纪的科学”的故事做了生动的描述，参看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㉕Mantegna, R.N., and Stanley, H.E., *An Introduction to Econophys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Samuelson, L., Evolutionary and Game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16, no.2, 2002, p.59.

③ Young, P., Individual Strategy and Social Structure: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Instit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④ Fogano, U.,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Diversity, London: Routledge, 2001.

⑤ Arthur, W.B., et al. (eds.) 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 II,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97.

⑥ Association for Japanese Evolutionary Economics; Y. Aruka (ed) Evolutionary Controversies in Economics: A new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 Springer, 2001.

⑦ Samuels, W., Austrian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ome Common Elements,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1989, 6.

⑧ O'hara, P. A., Marx, Veblen, and Contemporary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Edward Elgar, 2000.

⑨ Coriat, B. and Dosi, G., The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Change: An Appraisal of the “Evolutionary” and “Regulationist” Research Programmes, in Nielsen, K. and Johnson, B. (eds), Institu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1998, p.3.

⑩ Nelson, R.R., Bringing Institutions into Evolutionary Growth Theor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2, 6, pp.17-28.

⑪ 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载《学术月刊》，2002（12）。

⑫ Foster, J., The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From Biological Analogy to Economic Self-organis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997, 8, pp.427-451.

⑬ Hodgson, C.M.,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Ontolog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2, 6, pp.259-281.

⑭ Witt, U., Self-organisation and Economics—What Is New?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997, 8, pp.489-507.

⑮ Brook, D. and Wiley, E., Evolution as Entropy: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of B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⑯ Foster, J., Competitive Selection, Self-organisation and Joseph A. Schumpeter,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0, 6, p.311, p.312, p.325.



④7 Foss, N. J., Real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Journal of Social and Evolutionary Systems*, vol.17, no.1, 1994.

④8 Fleetwood, S., *Situating Critical Realism in Economics*, in Fleetwood, S. (ed), *Critical Realism in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Debate*, Routledge, 1999.

④9在英文文献中，一般把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泛滥称做经济学的形式化。根据 Dennis, K.的看法（见 Hodgson, G. M., Samuels, W. J. and Tool, M. R. (ed) *The Elgar Companion to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K*, Edward Elgar, 1994.），经济学的形式化是指以下三种含义：（1）全盘使用数学符号体系表述经济理论的命题，据说这在形式上是精确的；（2）通过形式演绎的过程应用数学推理得出某些结论；（3）就其经济实质而言，形式化意味着经济行为内在地上是可计算的，具有统一的规律，代表了基于数目字计算的理性秩序。本书为了突出其特点，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国内经济学教育对数学作用的过分迷恋，故改称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

⑤0 Allen, P. M., *Knowledge, ignora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 systems*, in Foster, J. and Metcalfe, J. S. (eds.) *Frontier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Edward Elgar, 2001, p.1.

⑤1 Hodgson, G. M., *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 O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s*, Edward Elgar, 1999, p.2.

⑤2杰奥尔杰斯库-罗金，一位富有创造力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数理经济学创立过程中的开拓者之一，但在其事业生涯的后半生，他转变成了对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趋势最严厉的批评者。

⑤3 Hodgson, G. M.,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Polity Press, 1993, p.16.

⑤4 M. 克莱因：《数学：确定性的丧失》，第335页，第321页，第362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⑤5 Georgescu-Roegen, N., *Methods in Economic Sc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 X III no.2 June 1979, pp.56-57.



演化经济学与科学哲学的 “哥白尼革命”

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有两个基本宗旨：科学的发展是一元的，其结构是演绎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实证主义这两个基本宗旨的批判，实证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统治地位遭到颠覆，但实证主义的概念并没有完全被放弃，主要原因就是批判者对科学变革和理论的非演绎特征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巴斯卡(Bhaskar)的贡献就在这个方面。“尤其是巴斯卡说明了，科学哲学中对反一元论和反演绎主义的理性认识的保留怎样需要一种新的本体论的建构，并相应地解释(自然)科学。事实上，它必然使科学哲学的方向改变到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非拟人的观念。这是哲学中的一种转变，被某些人称做科学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它是通过一种新的实在论科学哲学而完成的”^①。

这种新实在论科学哲学在经济学中被称做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指出的，批判实在论的发展根植于演化经济学各流派或异端经济学之中，反过来，它将成为演化经济学新的发展基础，因此，本章第一节将介绍和讨论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根据批判实在论，经济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相对，它使用的主要方法就

是比较方法，因此本章第二节将讨论比较经济学作为经验性的经济科学的总称与分支学科的问题。在这部分，笔者对传统比较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提出了作为分支学科的新比较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第一节 批判实在论论经济科学

一、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的“哥白尼革命”

批判实在论是超验实在论(transcendental Realism)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中的特称，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成熟于20世纪90年代。在此之前，除了作为批判实在论先驱、尚处于未发展状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外，经济学主要是受两种科学哲学的支配。第一种是在经济学中影响最大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目前在经济学中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就建基于这种科学哲学；第二种是主观主义或解释学传统的科学哲学，这个传统可以从哈耶克、韦伯、狄尔泰一直追溯到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它在现代奥地利学派和沙克尔(Shakelian)学派中影响最大。

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把科学看做是客观的和中立的，这种理论认为，所谓科学就是对事件间固定关联规律性的研究，这种看法是未假思索地从休谟对因果律的解释中接受下来的。休谟认为，世界是感觉的连续，心灵作为理智绝不能了解这些感觉之间的真正联系，对事物深层结构的任何本体论解释都是形而上学的，不可接受的，人们所能拥有的只是原子化的事物及其固定关联的经验。从这种固定关联的经验出发，科学规律采取了“每当有事件x，就有事件y”这种形式。演绎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而归纳则是以理论的预测准确与否作为标准，从不变的、客观的和中立的经验

出发对科学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检验。

主观主义或解释学传统的科学哲学基本上接受了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释，但同时又拒绝它对社会科学的适用性。解释学科学哲学认为，由于人类具有包括选择在内的能动作用，作为休谟规范的普遍的经验规律性在社会领域根本就不存在。因此，他们坚决主张社会科学应致力于意义(meaning)的阐释，追溯观念的联系，并从个人信念与行动中建构对社会整体的认识。

批判实在论通过识别实证主义与解释学科学哲学所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关于经济学的科学观念，从而实现了对这两者的超越。批判实在论认为，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合理性就在于它认为所有的科学(包括经济学)在基本方法上都是统一的，但对于究竟什么是科学的基本方法，它与实证主义又是相对立的；解释学科学哲学的合理性则在于它认识到，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目的和方法上又有所差异。然而，批判实在论并不赞同它对这些差异的认识。实证主义与解释学科学哲学共同的错误是把自然科学实践误解为对事件间固定关联普遍的经验规律性的研究，这源自它们对自然科学中实验活动的不恰当认识，批判实在论首先从这里入手，从而为超越这两种科学哲学内在的局限性奠定了基础。

二、实验活动与本体论

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集大成者巴斯卡观察到，自然科学中所得出的大部分事件的规律性事实上只发生于实验状态之中，它们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类干预的结果。规律只可表述为“在条件E之下，事件x固定地导致事件y”，而非“事件x固定地导致事件y”，条件E即代表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即实验状态的建立。根据这种观察，自然科学对任何实际事件规律性的认识离不开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巴斯卡还观察到，在受控实验活动中所得的结论或“规律”常常可以成功地应用于实验状态之外。这就是巴斯卡



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

为了解释这两个问题，巴斯卡指出，我们必须放弃自然是由事件规律性所构成的这种实证主义自然观，而把世界看做是有结构的，是不及物的，是不可化约为我们所经历的事件的。批判实在论认为，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些实际的体验或感受所构成，而且也是由更深层的结构、机制和趋势所构成，虽然它可能是无法直接观察的，但它却管束着我们经历到或未经经历的实际事件。与实证主义的实在论不同，批判实在论认为，实在本身远不是无景深的，而是复杂的，有差别和多层级的。三个重叠但本体上不同的实在领域被区分，即经验的(经历与印象)、实际的(除经验之外包括事件和事物状态)和真实的(除实际事件和经验外包括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

按照批判实在论，实在的这三个领域不仅在本体上是不同的，而且关键性的是它们相互之间是非同步或异相的(out of phase)。因此，当经验与事件异相，允许对给定事件的体验进行对比和修正的可能时，事件也典型地与管束它们的结构或机制是非同步的。例如，就结构与事件的不一致来说，秋叶与重力规律的作用是非同步的，因为秋叶是否落地也受制于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和其他的原因或趋势。

现在，我们就能对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做出解释了。按照批判实在论，秋叶落地的实际状态和管束秋叶落地的机制或结构是不一致的，秋叶落地是由重力的、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惯性的以及其他各种相互抵消、相互强化的多重机制所决定的。实验活动的作用就在于为了分离出某种机制，通过干预，把所有其他潜在的处于抵消或强化状态的机制隔离开来，建立起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作用并不在于创造一种使经验性规律发生作用的稀薄状态，而是致力于创造一种特定条件，在这种条件下，非经验性的规律、趋势或某种机制作用的方

式在经验上可以被确认。当然，规律本身总是在发挥着作用，只要存在着能引起反应的条件，机制就能被激活，不论是否别的在发生，例如，即使树叶在我手中，它也服从重力趋势。因此，受控实验中所发现的规律为什么常常能成功地应用于实验之外，原因是人们通过作用于自然界，激活了规律发挥作用的相关环境的结果。

与实证主义由经验和事件所组成的本体论不同，批判实在论本体论强调了管束事件与经验的结构化和不及物的维度。结构化是指世界不能化约为经验上的事件，不及物是指世界独立于人们对它的识别而存在和发挥作用。这种本体论上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科学观，当实证主义只局限于寻求事件的固定关联时，批判实在论则致力于揭示管束它的结构与机制。

但是，问题马上就出现了：如果实在的重要特点是不及物的（即结构与机制独立于我们对它的知识而存在）和有结构的（不可化约为我们直接经验到的现象），那么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我们才能了解它？对批判实在论来说，有关结构的知识不能只通过感觉经验而获得，但它们也不是无中生有的，所需要的是知识转变的观念。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要说新东西，但要使用旧材料。在科学中，人们通过干预并操纵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实验），转变着总是历史性暂存的对世界的解释。因此，在科学相统一的基本方法上，对批判实在论来说，实证主义有关演绎或归纳何者更好的争论是不相干的，回溯法(abduction)对结构与机制的研究是最基本的，它借助于类比与隐喻，从事物的“表象”回溯到事物的深层结构，从而揭示结构、事件与经验之间的因果机制。

三、回溯法与科学理论的创新

回溯法这个术语是由美国19世纪末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皮尔斯所创造，直译应该称做不明探测法，它是一种形成科学假说的过程。皮尔斯相信，演绎或归纳在科学中只有有限的作用。在科学



研究中，归纳的目的并非要得出“所有乌鸦都是黑的”，它所起的作用只是从大量经验事实中发出疑问：为什么乌鸦是黑的？这种疑问是探讨内在因果机制的发动因素，而演绎只是形式逻辑，其结论已包含在前提条件之中。正如皮尔斯所指出的，这两者从不会产生新的思想，所有科学思想的产生都是通过回溯法。在皮尔斯的心目中，回溯法是点燃各种事实相互联系的直觉创造力的火花，“不明探测法的联想闪现在我们心中，它是一种顿悟行为，虽然是极其错误的顿悟。确实，假说的不同要素从前已在我们心中，我们苦思冥想，但从未梦想把它们联系起来，正是新的联想使把它们放在一起的念头闪现出来”^②。

对皮尔斯来说，从一个学科到另一个学科隐喻上的回溯性转让是科学创造力的重要来源之一。霍奇逊总结了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指出了隐喻在理论创造中的作用。首先，隐喻涉及对实在的信念而不只是词语本身的含义。当把类似但不同的概念框架并列时，隐喻通过交互作用产生了新奇的语义学情境，如对社会经济理解的机械和生物学隐喻反映了不同的世界观。其次，隐喻可以使我们受到猛然一击，转向新的思考方法。刘易斯（Lewis, P.）发展了批判实在论的隐喻理论。他指出，隐喻就是运用已知的东西表达未知的事情。当科学家发展他们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时，“隐喻不只是语言上的修饰，相反，对于科学理论的概念、发展和主张来说，它在各种方式上是基本的：它们提供了语言脉络，在这种脉络中，构成科学解释基础的模型被说明和描述；它们为理论词汇表提供了新的术语，特别是在词典中（词义）存在差距时；尤其是通过提出新的假设的实体和机制，它们把科学家们的研究引向了新的途径。科学家们通过隐喻利用了从前已存在的认知资源，对于设想和调查管束可观察行为的未知机制来说，它同时提供了模型和词汇。因此，隐喻在科学理论的提出上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③。

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强调了想像、灵感和直觉在科学创造中的作用，日本著名科学家汤川秀树进一步讨论了这些因素如何通过类比成为创造性的思维。他指出，“我们已经知道，科学中有两种思维方法。一种是由培根提出并由伽利略卓有成效地运用了归纳法。它是从比较或多或少相似的经验或实验结果开始的。另一种是笛卡尔在指导自己思维活动时自觉地运用了演绎法。然而，很难发现在这两种方法中能够使人类思维成为真正创造性的根源何在，尽管我们很熟悉这两种方法……作为一种创造性思维的形式类比的实质是可以简单叙述的。假设存在一种什么事物是一个人不能理解的。他偶尔注意到了这一事物和他理解得很清楚的另一事物的相似性。他通过将两者比较可以理解在此刻之前尚不能理解的那种事物。如果他的理解是恰当的而且还不曾有别的人得到这样的理解，那么他就可以宣称他的思维确实是创造性的”^④。

正如现代哲学家罗蒂指出的，正如图像而非命题、隐喻而非陈述决定了我们的哲学信念一样，科学史上通过隐喻和类比实现理论创新的例子俯拾即是。如普利高津自幼对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浓厚兴趣是他发现大自然“时间之箭”的最初动因。众所周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达尔文革命中起过关键性的作用。有研究者认为，“生存斗争”的隐喻有助于达尔文从既有的生物学思想和理论中解放出来，而且，如果没有隐喻，达尔文理论的许多重要方面就无法表达。因此，隐喻与类比在科学革命时期尤其显得重要，它不仅有助于当事人从本专业已“锁定”的思维模式中挣脱出来，而且对新范式的形成发挥着强大的正面启发力量。由于新古典经济学锁定于早已过时的简化论、还原论和机械均衡观而不能自拔，21世纪初的理论经济学正酝酿着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最有可能在演化经济学中发生，因为“自然科学(确已)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



展现了一整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尤其是那些坚决反对在注重研究直线形均衡状态的科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以探寻普遍规律为旨趣的分析方法的学者早就持有的类似观点”^⑧。持有这些由来已久观点的学者就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者，本书的下一章将系统地讨论演化经济学与达尔文主义的关系。

正如隐喻与类比通过两个不同参照系的并置可以使从前分离的思想杂交一样，不同研究传统的杂交也可以产生重大的理论创新，本书所谓演化经济学是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就寄希望于其四大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

马克思是批判实在论和回溯法提倡者的先驱，所以我们在这里附带纠正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错误认识。首先，许多人把马克思的抽象等同于演绎。实际上，恩格斯早就指出，人的悟性活动可以区分为演绎、归纳和抽象三种活动^⑨。笔者认为，马克思的抽象就是我们这里的回溯法，辩证法是其精髓。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作为思维规律是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这种永无休止的运动之中去考察事物之间的关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辩证法之所以“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是)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⑩对恩格斯来说，类比与隐喻是最富创造性的研究方法，是辩证思维赖以产生的基础。其次，许多人把抽象等同于社会科学的方法并忽视经验研究方法，从而助长了演绎主义的错误。与批判实在论现代科学哲学家一样，马克思认识到，由于作为科学对象的人类具有能动性，所以通过实验这种人为干预营造封闭系统的价值就非常有限，所以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⑪然而，正如我们已讨论的，抽象并非惟一的是社会科



学的特征，它也是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统一的，它们都需要抽象力以穿透事物的表现形式以探求其深层结构。但正如实验是自然科学的经验方法一样，抽象离开了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具体的和经验的研究方法，它就如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蜕变为演绎主义了，这就是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命运。

四、社会经济本体论与经济学的目的

我们已经观察到，在自然领域中，固定的事件关联只是在实验控制条件下才能自发地产生。在社会领域中，通过实验控制获得这种固定事件关联的可能性是相当有限的。如果说自然与社会领域中所发生的事件或事物状态都是以其深层结构为基础的，那么，由于人类具有真正的选择性，社会经济领域在本体论上与自然领域所存在的重大差别就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存在依赖于人类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包括人类的观点与行动。正是因为如此，社会结构只能展现于处于开放系统的人类活动之中。由此推论，任何经济规律必然只能表现为趋势，除在极稀少的情况下如人类有意识规定的每年假日的发生外，所谓固定关联的事件规律性在人类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念在社会领域中是误导性的。考虑到人类社会的特点，巴斯卡和劳森(Lawson, T.)等阐述了批判实在论有关社会本体论的两个最持久和最有意义的基本信念。

第一个基本信念涉及社会结构、人类主观性以及这两者之间内在相关的理解。批判实在论认为，在一个开放与结构化的世界中，人类的能动作用依赖于结构与机制；反过来，社会结构的任何方面也依赖于人类的能动性。结构与能动作用互为前提。批判实在论社会经济本体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吸收了哈耶克以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有关社会存在的观念依赖这种解释学见解，但又避免了解释学把观念依赖与观念决定混为一谈的错误，并指出，社会结构不只是依赖于人们的观念，而且同样依赖于人们的

活动与实践，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作用。因为社会结构依赖于人们的能动作用，所以它不能处理为给定的；同时，它也不能被看做是个人的产物，因为个人有目的的行动是以它的预先存在为前提的。在这里，相关的概念必定是再生产和转变(transformation)，个人行动者利用了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为其行动典型地未知的条件，通过所有个人在总体上采取的行动，社会结构无目的被再生产或转变。

批判实在论社会经济本体论的第二个基本信念是所有的社会结构和体系都依赖于内在的社会关系或以其为前提。因为，虽然人类的能动作用与社会经济结构相互构成，但这两者又是相当不同的事物。使这两种相当不同的事物发生接触的正是(内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只有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才能说明个人如何因其自身原因采取行动，同时又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再生产做出了贡献。根据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批判实在论既拒绝方法论个人主义，又拒绝方法论集体主义。

批判实在论本体论为经济科学提供了既不同于实证主义又不同于解释学的科学目的。首先，由于认识到实证主义所谓的事件规律性在经济领域中是极稀少的，因此，经济学的主要目的被看做是确认管束社会事件或其状态的社会经济结构，对有关人类实践的识别、理解和解释，即识别和理解这些实践未知的条件、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所利用的意会性技能和意外的后果。其次，由此所产生的政策目标主要的不是对未来的预测性控制⁹⁹，而是通过对管束和便利人类行动的结构条件有见识的转变而达到人类的解放，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结构转变，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发挥创造潜力的机会。最后，因为社会结构对人们的实践所产生的转变是开放的，而人们实践的转变要依赖于他们对世界所持有的观念和理解。所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就是通过对人们的观念和理解进行批判

性解释，以推动在社会结构与人类能动作用之间所能达成一致的转变，这是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标签中“批判”这个术语所蕴涵的意义。

五、经济学作为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

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家劳森写道，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依赖于人类能动作用的转变潜能，社会经济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相对持久的，它不可避免地是以时空制约或地理历史(geo-historically)为基础的²⁰，因此，经济学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在其性质上必然是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存在着为所有人类社会所共有的表现为趋势的社会经济规律，而是强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多数规律只具有历史的暂存性，并与地方化的条件高度相关，这一认识来自爱因斯坦时空密不可分和相互渗透、空间是时间存在形式的宇宙观。马克思、历史学派、旧制度学派和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家都坚决反对把社会科学只看做是研究普遍规律而否认社会历史发展具有特殊性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观。

实证主义普遍规律的科学哲学观源自于对自然科学实践的不恰当认识。首先，自然规律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正如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是以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定条件为基础的一样，自然规律如水溶解糖只是在水存在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这两个条件目前只有存在于地球，但很明显在金星和月球上并不存在。其次，似乎有这种情况如牛顿定律不取决于时空定位。然而，一旦我们转向宇宙学，研究宇宙的起源及其发展方式时，上述例子也是有问题的。正如物理学家弗里曼所说的，重力绝对随时间而变化，它取决于时间开始以来究竟有多长。宇宙本身是动态的和不断演化的，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只不过是要持续不断地改进相对不变(或缓慢变化)的有关实在的理论，而社会科学家则要更快地改进他们对相对快速变化，特别是具有高度时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

解”。

时空特定性是系统复杂程度高低的函数，虽然复杂性本身并不是有机系统和无机系统之间的基本区别，但从物理系统到生物系统再到人类社会系统，确实是一个复杂性程度不断增加的过程。因此，社会科学更有资格作为复杂系统科学的代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90年代所产生的复杂系统科学革命却主要的的是由具有哲学修养的物理科学家和生物学家等所推动的，在复杂系统科学领域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阿瑟起初在经济学领域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20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进展就是用动态的、有机的和非线性的宇宙观替代了近代以来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静态的、机械的和线性的宇宙观。复杂系统科学在社会科学领域虽有某些先驱，如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等(就我所熟悉的经济学家而言)，但由于社会科学的主流自19世纪末以来所形成的对自然科学顶礼膜拜的思维习惯，使他们不仅无法认识到马克思等先驱者思想遗产的潜在价值，也无法认识到这些先驱者的历史局限性，因而，社会科学家从整体上来说在科学观念的“跨时代”转变之中再次滞后。

复杂系统科学认识到世界本身是由多重因素相互交叉、由网络式的反馈环路和非线性的不可逆过程所结构化的世界。非线性和不可逆的网络式反馈过程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和事物的特有形式(即时空特定性)，这种多样性和时空特定性随系统的复杂程度而增加。自然历史作为一个演化过程，是一种新奇和多样性不断突现的过程。从物理系统中突现(emergent)出的生物系统，正如迈尔所指出的，使多样性已构成生态系统的基础，这种多样性使自然选择成为可能，从而使进化生物学成为研究多样性的科学。而由生物系统所突现出的人类社会又在生(动)物意识基础之上增加了“自反思”的文化系统，从而使康芒斯所谓的人工选择成为可能。复杂层级的增加意味着每层级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和因果机制，它

虽以低层级为基础，但科学解释不能采用还原和简化的做法，例如生物科学是由生命过程和多样性这两大主题所构成的，从而产生了研究控制—动能—组织的功能生物学和群体—历史程序—特异性—适应的进化生物学²³。功能生物学家运用与物理化学家同样的实验方法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现在某些功能生物学家已认识到，生命过程绝不是简单的物理化学现象，其复杂性是单纯的物理化学手段所无法解决的。而对于进化生物学来说，物理化学的方法基本上是不适用的，它对定性、历史、信息和选择值等问题有着特别的兴趣，这对沟通物理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起着重要作用²⁴。生物多样性和进化是以地理和时间维度的变异(时空特定性)为特征的，自然选择是以作为生命过程的基因为基础的，意识和有目的的活动对于这种变异和选择起不到多大作用。相反，人类社会的演化基本上是依赖于有目的的活动或人类的能动性，知识或文化在地理和时间维度上的变异不仅大于而且也快于生物变异，因而人类社会系统要比生物系统具有更大程度的时空特定性和多样性。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只是影响人类社会时空特定性和多样性的重要因素而非根源，与物理和生物系统一样，人类社会的时空特定性和多样性同样源于复杂系统之中非线性反馈的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六、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比较科学

如果普遍的、固定的事件关联在实验状态之外很少能够发生，那么，在社会领域中，受控实验非常有限的机会对于一种成功的经济科学来说，是否构成了无法克服的障碍？进一步说，在实验控制可能性很小的条件下，如何进行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劳森指出，对于反对演绎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些问题已成为方法论讨论的焦点。

我们知道，近代科学的兴起是以实验科学为特征的，而且，实验是现代科学乃至未来科学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但是，实验



方法并不是自然科学的惟一方法。近代以来，在进化生物学、地质学、气象学和天文学等学科中，受控实验的机会一直受到很大的限制。这种情况说明，实验方法非常适合于研究存在性的科学，其特征是对整体进行分解，采用还原方法进行研究，但对于历史性的演化科学或目前正兴起的复杂系统科学来说，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自近代以来，科学自身的发展已使新的认识方法不断突现，目前我们已有四种相当成熟的科学方法：笛卡尔式、培根式、历史式和比较式⁴⁹。历史与比较方法虽然有某些先行者，如生物学家和科学史家迈尔指出，生物学家居维叶是比较方法第一个伟大的战士。但这两种方法却是随达尔文革命和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维托德·瓦斯尼基指出，到20世纪20年代，比较式认知(以及历史式认知——引者)被放在了与培根式和笛卡尔式同等的立足点上。笔者认为，现在它已成为演化或复杂系统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法之一。

正如迈尔所指出的，实验与比较方法的区别，并不像最初看来那样大。在这两种方法中，观察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从事实验的人常常并不指出他们的结果应该归功于实验中的观察。在物理化学和功能生物学中，自然过程从不存在或很少能展示进行直接观察的条件，所以以受控实验为基础的实验方法就成为科学观察的基本条件；但在以多样性为基础的科学如进化生物学和演化经济学中，多样性与差异的存在就为直接观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进化生物学和演化经济学中，通过经验观察所获得的信息，其存在形式既非受控实验中严格的事件规律性，也非完全无系统和随机的，而是呈现为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不完全规律性(demi-regularities)。正如劳森所指出的，在社会领域中，“如果某些趋势或趋势的结合在某种值得注意的时空结构中不断地被激活，或某种重要的趋势对其他趋势起着支配作用，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非不可能在实际现象中发现它们的作用”⁵⁰。尽管这种作用是

片面的，呈现为一种特有形式，但这种可观察到的粗略形式或半规律性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某种相对持久和潜在可识别的机制正在发挥作用的信息。同样，对于那些很少有受控实验机会的自然科学学科如天文学、地质学和进化生物学等来说，正如潘廷(pantin)所指出的，“对于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的自然事件的观察，有时候能够提供的信息和以实验得到的信息一样，完全充分足以得出结论”⁴⁷。

为了说明由经验观察所获得的半规律性和比较方法对经济科学的重要性，进一步考虑受控实验的特定条件是有益的。正如汤川秀树所认为的：基本上是使用归纳法的实验科学是从比较或多或少相似的经验或实验结果开始的。劳森也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实验都致力于保持背景条件不变，相反，实验控制经常采用对具有共同或类似历史以及具有共同(如果不是不变)的条件的两个(或更多)参与组进行比较的方式进行，其目的是把某种特定效应与引起某种结果的因素联系起来。因而，比较方法不仅是研究多样性科学的基础，而且也是实验方法重要的组成部分或其基础。更有甚者，回溯法也是以比较为基础的，类比无疑也是比较。因此，正如劳森所指出的，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科学解释内在的都是对比的(contrastives)。在社会科学中，作为研究基础的半规律性总是以对比形式出现，被称做是对比的社会半规律性(contrastive social demi-regs)。换言之，在半规律性标题下所收集的经验事实，通常取决于比较，特别是取决于差异。通过对不同时空区位中可比类活动在结果上的系统性差异进行比较，或对不同时空区位中不同活动所产生的类似结果进行比较，以及对可比时空区位中不同活动类型差异的比较，我们可以确认深层结构或因果机制的效应，确认一种或几种因素的结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而非别的情况下导致了这种半规律性的产生。因此，对于经济科学来说，“比较研究对理论发展的作用在一定意义可以类比于自然科

学中实验与其理论之间的关系”²³。然而，正如自然科学中理论的提出是在实验基础之上运用回溯法的结果一样，通过比较所确认的只不过是事物深层因果机制所呈现出的效应或半规律性，因果机制本身的确认必须以此为基础，通过类比和隐喻这种回溯过程才能获得，这与自然科学并无差别。

第二节 比较经济学：经验科学的总称与分支学科

一、比较经济学：经验科学的总称

从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中，我们已得出如下基本结论：比较方法不仅是研究多样性科学的基础，而且也是实验方法和理论创造最重要的基础。对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来说，比较是主要的方法。实验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可以预期，它对经济学的发展不会做出多大的贡献。由于实验方法在经济学中发挥着非常有限的作用，比较方法在经验观察中，就执行着类似于自然科学中实验的作用。笔者经常对学生强调理论的重要性，这是因为“观察渗透着理论”。但总的来说，经济学主要的是一门经验性的科学，它所有的理论创造都要以实际问题为目标。

笔者在阅读《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时，得到的一个深刻印象是，发展经济学早期年代的重要理论创造基本上都是起源于经验研究。鲍尔勋爵对马来西亚和西非的实地调查使他对许多传统的经济学观念提出了挑战；赫尔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来自担任哥伦比亚经济和财政顾问的经验；刘易斯因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它的灵感是来自走在曼谷的一条街道上之时，这与他对发展中经济的实际研究

具有密切关系……因此，三次产业理论的创造者之一克拉克写道，“我一直深深地相信，经济学应当基于经验观察和对已实际发生的现象进行分类，而理论只是第二位的……从在英国政府的经济咨询委员会工作的初期开始，我就逐渐赞赏这样的信条，经济学应当是从比较性的观察、而不是从事先的假设中推演出来”^[1]。

为什么说比较经济学是经验科学的总称呢？这种观念不仅是笔者经济学实践的结论，也是通过类比所得到的。笔者早就提出，我们可以把一般经济理论的发展与比较经济学的关系类比于理论物理学与实验物理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据笔者所知，在物理学中，物理学的分支学科包括力学、光学、电磁学等。而理论物理学和实验物理学并不是物理学的分支学科，它只是对物理学家所侧重工作的一种大致的区分。物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既有理论又有实验，实验物理学只不过是对物理学的经验性工作的一种笼统的称呼而已，侧重于经验性工作的物理学家就称为实验物理学家。那么，同理，如果说经济学是基于比较性观察的科学，我们就可以把侧重于经验性的经济学研究统称为比较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的性质类似于实验物理学。根据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这种推论，比较经济学就不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经济学中经验科学的总称，正如实验物理学一样。

笔者认为，理论物理学和实验物理学的区分有利于理论与实际的交互作用。但在经济学中就不是这样，按照我们通常的划分，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属于理论经济学，而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属于应用经济学。笔者认为，这种划分并不能成立，因为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等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等理论的应用，它不仅有自己的理论，有时研究的大多数问题与政治经济学等无关。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地理空间的重要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了，它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如此重要，以至于有的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理论的地理学化”的命题。我



们这里不讨论这种命题的对错，只是指出，由地理空间的研究得出的理论要被应用到经济史的研究，并重塑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那么谁是理论经济学，谁是应用经济学？而且，我们目前对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划分助长了前者脱离实际和后者不重视理论的倾向，这不利于经济科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对于那种只把比较经济学看做分支学科的观念来说，批判实在论无疑提供了一种革命性的思想，比较经济学从分支学科到经验科学的总称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如果是这样，还有必要保留比较经济学这个分支学科吗？笔者认为，比较经济学一身二任不无不可，但作为分支学科，它同样需要革命性的思想。

二、比较经济学新的哲学基础

无疑，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对比较方法重要性的强调已大大提高了比较经济学在经济科学中的地位。但是，有趣的是，与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对比较经济学研究所形成的高潮相比，自1990年前苏联、东欧剧变以来，比较经济学的建设在我国一直都处于低潮。现在仍有一些人认为，由于前苏联、东欧已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比较研究的对象之一业已消失，比较经济学就没有什么可比较的了。然而，近年来对中俄转轨经济比较研究所提供的经验材料却揭示了比较经济学非但没有随前苏联、东欧的剧变而消失，反而其重要性却大大提高了。

“休克疗法”在前苏联、东欧特别是俄罗斯的失败，表明了长期以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传统和演绎方法的破产，人类自身的“有限理性”揭示了比较式认知无论是在社会经济实践，还是在经济学研究中都具有更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比较经济学研究对迄今为止我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无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这种认识尚未上升到本体论的角度。为什么“休克疗法”的理性设计师们企图在一夜之间用西方式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为什么东欧和俄罗斯的政策制定者们

在转轨之初全盘照搬外国制度？为什么我们没有在转轨之初就认识到，比较经济学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要比从前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呢？我们并不怀疑“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们和俄罗斯政策制定者等所抱有的良好愿望，也不怀疑我们自己与“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们可能都拥有较为广博的经济学知识，只是怀疑世界的本来面目是否如我们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怀疑人们的认知仅仅是“有限理性”的，还是具有特异性？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为比较经济学提供一种新的哲学基础。

由于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对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精密科学的模仿，经济学数学化即是突出的体现，同时也是由于受实证主义所谓在科学中驱除“形而上学的(即哲学的)”思辨这种科学哲学的影响，经济学先天就接受了支配物理科学家思想方式的柏拉图本质论哲学，而促成达尔文革命的个体群思想对主流经济学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在柏拉图看来，可变化的现象世界只不过是固定不变的形式——即理念(柏拉图的说明)或“本质”(中世纪托马斯主义者的说明)的类似的反映，世界上真实的和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本质，变异是内在本质的不完美表现，真正的变化只有通过新本质的跳跃式出现才有可能，它强调类型价值(类型学)。相反，个体群思想家则强调在有机世界中每件事物的特异性，在他们看来，重要的东西是个体，而不是类型(type)。生物学中被指称为组的东西是由特异的个体²³组成的个体群，变异和多样性是自然的本性而非某种本质的畸变，进化是一种渐进而非跳跃式的过程²⁴。

“休克疗法”的理性设计师们实际上把剧变之前在东欧改革中所产生的经济体制视做计划经济内在本质不完美的表现。在他们看来，要实行市场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才是其内在本质的完美要求，从计划经济或其不完美表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只能采取爆炸式(big-bang)的跳跃，才能导致市场经济新本质的出现。“休克疗法”的支持者喜欢说：“你不可能分两步跳过一个深谷。”这种思

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受柏拉图本质论哲学所支配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不仅否认在计划经济与英美式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第三条道路，而且甚至有可能把日本和德国经济体制也看做是对尽善尽美市场经济原型的一种偏离或畸变。

然而，中国改革经验对这种本质论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这种隐喻反映出了改革者对自身“有限理性”的清醒认识。因此，在改革过程中，虽然政府领导人包括激进改革派，对于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非法竞争”，甚至经济特区等许多非正统的改革措施都持有怀疑态度，但他们并没有压制而是容忍了这些异端的做法²⁸。中国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其不自觉地对群体思想的应月，充分发挥个体和地方的积极性，允许多样化的制度尝试，实际上是暗含着对个体特异性与创造性的朦胧意识。而所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而是揭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时空制约性。因此，由于社会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路径依赖且不可预测的制度演化过程，多样化的制度尝试必然使其呈现为渐进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在其经验上蕴涵着与东欧、俄罗斯的转轨具有相当不同的世界观，它为比较经济学采纳个体群思想作为新的哲学基础提供了重要的例证。

三、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缺陷

比较经济学“消亡论”实质上是本质论思维的反映，比较经济学就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来说与这种思维方式是不相容的。但与此相悖，比较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诞生却是本质论思维的产物。这种本质论思维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主义”比较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说明，在当时比较经济学家的心目中，比较经济学的存在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两大“主义”制度所出现的各种不同变种的“刺激”，比较经济学开

始摆脱本质论的思维。1967年至1968年西方学者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比较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许多学者呼吁打破以“主义”划分经济体制的传统，这种呼声得到了普遍的响应²³，比较经济学才开始“真正地”繁荣起来。但是，由于它从未意识到本质论思维对本学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所以它只能在前苏联、东欧剧变的烈焰之中才能得到新生。

由于意识到传统比较经济学所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有可能对新理论的名声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措辞战略上，青木昌彦等人试图用“比较制度分析”取代“比较经济学”这种传统的学科称谓，并赋予这种新经济学以多样化的机制和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历史使命。无疑，这种理念已较为彻底地摆脱了本质论思维的支配，在相当大程度上与群体思想具有一致性，这是比较制度分析在近10年来得到迅速发展并取得重要成果的原因之一。青木昌彦等人的创见虽然来自于对传统比较经济学的反思，但没有深究其学科存在的哲学基础，也未能对传统比较经济学所存在的缺陷进行系统反思，这使他们的视野不能不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我们认为，比较制度分析不能替代比较经济学，而且它也不是比较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传统比较经济学除缺乏坚实的哲学基础之外，还存在着以下三个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主要是满足于运用已有的理论对各国经济体制进行分类和比较，而忽视了比较经济研究最重要的功能，即通过经验性的工作对现有理论提出挑战，从而为运用回溯法提出新的因果假说奠定最重要的基础。我们已经把一般经济理论的发展与比较经济学的关系类比为理论物理学与实验物理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虽然物理学中的重大革命如哥白尼日心说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并非实验工作的结果，但无疑实验物理学通过“异常”（即已有理论无法解释新的经验事实）的累积，为物理学理论的革命铺平了道路。正如实验物理学对于量子力学革命所起的作用一样，而且在

“常规科学”发展时期，实验物理学对理论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在传统的比较经济学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它对一般经济理论批判性的建设作用。

第二，传统比较经济学仍受主流经济学所谓理性最大化和必然进步这种观念的支配，因而是前达尔文的。达尔文革命彻底去除了必然进步的观念，否决了理性最优范式的科学性。在比较经济学，不论“研究经济体制的一个原因是发现哪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²⁴，还是论证社会主义的内在优越性，这些研究目标都是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这种思维的反映。人类历史一再证明，文明的进步并不能保证理性和最优的结果，例如，西欧文明在经历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高度的发展之后，坠入了长达500年之久的“黑暗”中世纪；当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展示了新的希望，并在19世纪带来了人类道德和物质进步之后，20世纪却又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野蛮暴力行径。正如迈尔指出的，在生物学中，研究多样性的学者指明了每个物种都是独特的，因此也是不可替代的，从而教会我们尊重自然的多样性。比较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体制多样性的科学，只有彻底放弃先验的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的观念，才能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提供较为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三，传统比较经济学在理论基础上是结构主义的，而且这种“结构”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这严重地制约着比较经济学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的研究。结构主义在经济学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它与批判实在论在批判个人主义和解释学经济学方法论上具有共同之处，但与批判实在论强调结构与能动作用的相互构成不同，结构主义更偏向于强调结构对能动性的决定作用。在经济学中，结构主义与老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等经济学研究传统中的主流密切相关，他们把制度、生产方式、社会心理结构、文化、历史和宏观经济等看做是经济事件和行为的决定性变量²⁵。结构主义由于很少注意到能动性对结构

的转变作用，所以在比较经济学中，它对导致经济体制产生变异的新奇事物缺乏敏锐性，例如，传统比较经济学在青木昌彦(1990)对日式企业的研究成果发表之前，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在青木昌彦的经典论文发表之后，传统比较经济学也未能充分意识到日式企业对日本经济体制的重大影响。而且，结构主义在比较经济学中也是残缺不全的。由于受19世纪初以来主流社会科会严格的学科划界影响，比较经济学从未深究马克思、波拉尼和熊彼特等有关经济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论断对本学科建设的重大意义，因此，只关注结构的经济方面，而把其他方面视为外生变量。我们怎么有可能深究为什么“同一经济制度，可能因为生产力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差异，政治的、历史的、文化传统的，甚至地理条件的不同而表现为极不相同的经济体制”^②呢？我们怎么有可能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做出历史^③性的说明呢？因此，为了对比较经济学提出新的研究任务，我们有必要首先讨论比较经济学中社会经济结构的观念，并重新认识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方法。

四、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社会经济系统(或体制，复数，即 systems)的研究是复杂系统科学中难度最大的领域，作为初步和尝试性的工作，其主要问题是怎样把一个无穷多变量的系统简化成一个相对简单的低维数系统^④。对于比较经济学来说，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可处理的对象问题。按照批判实在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确认管束社会事件或其状态的社会经济结构。但是，它对结构概念的定义相当宽泛，劳森用来指组成社会经济系统的“规则、关系和地位”^⑤等等。批判实在论的特点是赋予社会经济结构以本体论的地位，这是一种能够展示因果力量和突现特征的结构概念，例子包括“经济、家庭、语言”和“人口统计的结构”^⑥。

很明显，批判实在论理论家并未考虑到社会经济系统或体制

比较研究的需要。在比较经济学中，“经济体制”这个概念是一个关键性的术语，它最先是在19世纪下半叶，由欧陆经济学家们尤其是德国历史学派在讨论中提出的。桑巴特在1916年提出，经济体制这个概念应该抓住划时代的经济构成的经济、社会和制度特点³⁴。具体地说，经济体制应该包括三个维度：从事经济活动占支配地位的“精神”；经济活动的组织；流行的技术。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狭义比较经济学即比较经济体制在使用“经济体制”这个概念时，与其首创者是相当不同的。桑巴特以及历史学派对经济体制的思考是从经济现象不可分的“格式塔”³⁵形态出发的，即对象是相互依赖的有结构的整体。笔者受中国经济改革实践所启发，运用复杂系统思维，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文本的重新阅读等，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应是由经济、政治、文化认知模式、技术和生态地理五个亚系统所构成的系统结构。随后，笔者在陈平新出版的著作中发现了类似的思路：“影响社会演化的主要因素包括地理、生态、技术、人口、经济、文化、政治以及战争类型。我的问题是：这些因素在历史上是如何相互作用、如何影响社会演化的。”³⁶

笔者认为，比较经济学可以运用上述系统要素进行比较研究。然而，社会经济结构并不单独构成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为，如果是这样，它就无法避免传统比较经济学结构主义的俗套。按照批判实在论，社会经济结构的存在与自然结构如电磁场的“自在”方式不同，它无法独立于人们的实践活动而存在，能动作用是社会经济结构再生产和转变的前提条件。因此，与传统比较经济学结构主义的静态观不同，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必须把能动作用放在与结构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研究，即从结构与能动作用交互构成这种本体论意义上，动态地和辩证地把握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经济系统。

能动作用最突出的特征是新奇事物的出现及其扩散，它是导

致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的基本力量。新奇事物是个体³⁴独创性的结果，虽然它与原有社会经济结构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是与之相异质的，是从原有社会经济结构中所“突现”出的不同事物，它源自于个体对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转变意会性的和特异的知识及其技能。新奇事物是体制变异的根源，它在扩散过程中进一步的发展、变异及其与其他新奇事物的结合，构成了结构转变以及体制多样化的基础。在比较研究中，为了更好地应用群体思想，对于新奇事物的出现和扩散可以采用两种互补的研究方法，前者主要使用个体发生论，以便追溯变异是如何产生的，识别、理解和进一步阐释其意会性和特异性的知识与技能；后者主要使用系统发生论，揭示新奇事物的扩散、进一步变异和与其他新奇事物相结合的结构性的制约条件。

在运用个体和系统发生论时，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必须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与地理背景之中，这就是经济学作为复杂系统科学在比较研究中所采用的情境和脉络特定(context³⁵ specific)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社会科学中最早可以追溯到老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那里，实际上它在进化生物学的比较方法中也处于核心地位。目前，我们可以在老制度学派、比较制度分析、创新体系以及管理学有关组织与战略的跨国比较中看到这种方法的应用。管理学家克拉克分析了亨利·福特如果在英国伯明翰—考文垂工业走廊而不是在美国发动T型车的生产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³⁶。亨利·福特1908年有关T型车生产的计划预示着工业生产和流通体制的一场革命，即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时代的到来，它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奠定了微观组织基础。克拉克运用波特产业与地区簇群理论从18种因素分析了在英国无法产生T型车这种新奇事物的原因，揭示了隐藏的结构要素和特定的地区情境对竞争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英国由于原先的工业领先在企业组织、手工工艺技术传统和思维方式上所导致的“锁定(lock-in)”，也包括

缺乏由美国地理及人口等因素所导致的一体化市场对流水线生产的诱导。

类似的例子还包括为什么同是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的工业技术在日本却导致了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异，产生了现场改革、岗位轮换制、全面质量管理和丰田生产方式？而日本企业组织前三个要素就其精神实质与中国几乎同时产生的“鞍钢宪法”^②具有相当大程度的一致性，命运为什么截然不同？笔者在《“鞍钢宪法”的历史教训与我国跨越式发展战略》一文中指出，组织革命是跨越式发展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组织正经历着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鞍钢宪法”与日本模式曾同为后福特制的先驱，但与日本模式启发了知识经济在组织上的变革有很大不同，不利的国际结构制约条件、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选择以及国民视野的局限性使“鞍钢宪法”无法成长为未来组织演变的基础。该文认为，“鞍钢宪法”为我国跨越式发展战略提供了以下重要的启示：对世界发展潮流高度敏感并对直觉意识不断反思；不断突破思维和视野的局限；维护并发展我们得之不易的自由而又稳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利用传统的文化和组织资源实现制度创新。论文还从生态地理条件等方面对后福特制在我国发展的特定情境进行了扼要讨论，并认为这是跨越式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③。

更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繁荣基础的三大制度支柱，即福特制(Fordism)、社会保障制度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作为新奇事物最早分别产生于美国(1908年)、德国(1883年的医疗保险)和英国(1936年)，而在美国却结合得更好？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启发我们，中国在21世纪能否实现跨越式科技创新或经济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持谨慎态度，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往往是在动态演化的时空背景之下，由作为潜意识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有意识的能动作用交互

作用所导致的意外结果，比较经济研究以其“有限的理性”可以为理解这种过程提供必要的借鉴。

五、比较经济学新的研究任务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把比较经济学新的研究任务总结如下：

第一，揭示结构性制约条件及其与能动作用和偶然性因素如何结合导致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识别、理解和进一步阐释多样化体制下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意会性知识和技能，为政策制定提供来自于不同经验的知识基础。例如，中国1977年与10年后俄罗斯在改革起步时所面临的结构性制约条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不仅包括由历史因素所导致的中俄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体制的同型异构、改革前农业与工业体制所存在的差异³⁸，也包括当时国内外环境对改革战略的形成所产生的制约。中国改革战略的选择无疑利用了过去的经验与教训，“摸着石头过河”的隐喻来自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惨痛教训的意会性知识，允许多样性尝试和特区的创设等来自于改革前实验传统的意会性技能。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已有的或刚刚发生的不同经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面对尚未形成但仍有端倪可得的结构和意会性知识，它可以为政策研究和制定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第二，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新奇事物的出现及其扩散通过社会经济结构与能动作用交互作用导致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与生物基因的突变有好也有坏一样，这里所谓新奇事物是一个中性概念，有的可以导致社会经济的进步，但有的却使社会经济系统发生退化，如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和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新奇事物的起源可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由于技术变迁所带来的物质环境的变化，生态环境的退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演变，外部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在个体思维与行为模式上所发生的突变。这里的个



体包括从个人、组织、地区到国家等，个人的例子有对美国工业组织产生重大影响的泰勒制和福特制；组织的例子有丰田生产方式（即及时生产，Just-in-time）和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制；地区发展模式有硅谷和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区；国家的例子有德式职业培训、日式品质管理和中国的乡镇企业等。目前人们已经注意到，信息革命对劳动、企业和产业组织、对金融、流通和宏观经济等正在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比较研究关注的是它在不同的经济中包括中国有可能产生的多样性发展及其对地区和国家竞争力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与经济学其他学科对研究上述新奇事物提供的专业背景知识不同，比较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进行复杂系统思维的训练，把它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进行比较评估，因之它更能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第三，促进跨国制度学习。比较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业已说明，制度学习是导致德国、美国以及日本相对于英国后来居上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的改革目前已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世界各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的结果。成功的制度学习关键在于其精神而非具体形式，外国制度的引进、修改和创新是以国家或当地的情境和脉络为条件的，完全照搬很少能够成功。例如，提高质量的方法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就在AT&T的西方电气公司中出现了，1924年，贝尔实验室的一位物理学家发展了统计质量控制的方法，20世纪50年代初这种管理工程性质的质量控制方法通过美国管理学顾问传到日本，但在日本却演变成了群众性的全面质量管理这种组织创新，而在美国，质量控制的使用却退化了。“及时生产”是本土生土长的制度创新，1947年就在丰田公司出现了，1955年左右扩散到丰田的供应商，1970年左右在日本其他汽车制造商中得到了更普遍的扩散⁴⁰。上述组织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大大刺激了美国产业界，但他们无法照搬日本模式，而是与自身在信息技术上的优势和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孕育

了蜂窝状网络组织这种创新。比较经济学运用情境和脉络特定的分析方法，对制度原生国与引入国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大力促进制度学习与创新。

第四，创造性地阐释文化传统，并揭露现有经济理论所存在的缺陷。技术与制度变迁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是理解、适应和学习这种文化阐释过程。技术和制度创新，特别是从国外所引入的，它所蕴涵的意会性知识与传统观念必定有一定程度的冲突，这就需要文化意义系统进行局部修改乃至重新阐释，使产生创新的意会性知识纳入到正在演变的文化传统之中，从而为导致结构转变的能动作用提供基础。比较研究通过揭示同种技术、特定制度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历史渊源，在这种文化阐释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济理论在其性质上与文化传统相类似，社会经济结构的阶段性变化要求经济学家们要相应地改进他们对经济世界的认知、理解和解释，比较经济学所采用的系统的与情境和脉络特定的比较方法由于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所以它通过经验事实的累积在发现理论经济学所存在的缺陷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中俄转轨经济的比较业已证明，“经济学是理性选择的科学”这种提法是站不住脚的。

注 释：

① Archer, M., Bhaskar, R., Collier, A., Lawson, T. and Norrie, A. (eds) *Critical Realism: Essential Readings*, Routledge, 1998, p.3.

② Hodgson, G.M.,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Bringing Life Back into Economics*, Polity, 1993, p.17.

③ Lewis, P., *Metaphor and Critical Realism*, in Fleetwood, S. (ed), *Critical Realism in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Debate*, Routledge, 1999.

④ 汤川秀树：《创造力与直觉》，转引自马小兵选编：《理性中的灵感》，第

191-19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⑤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第68页。

⑥恩格斯的原话为“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6页。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页。

⑨对未来的预测性控制是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目标，它是基于“每当有事件x便有事件y”这种在经济现实中被稀少存在的所谓事件间的规律性认识，其政策目标是希望通过固定事件x，预期未来事件y被决定，强调的重点在于控制和事物状态的改进，但排除了政策对其结构性条件的转变作用。而且，由于新奇(即未来事件)是不可预测的，由现有事件x推论并对未来事件加以控制这种政策目标往往是不现实的。

⑩Lawson, T., "Economic and Reality", Routledge, 1997, p.196.

⑪Lawson, T., "Economic and Reality", Routledge, 1997, P.224.

⑫厄恩斯特·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多样性、进化与遗传》，第7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⑬厄恩斯特·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多样性、进化与遗传》，第8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⑭同时必须注意到，全球化过程及其加速所导致的知识杂交会使已产生的特定性迅速发生变化，从而诱发新的特定性，因而社会演化速度随时间推移具有加速度的特征。

⑮维托德·瓦斯尼基：《知识、创新和经济》，江西教育出版社，第89页，1999。

⑯Lawson, T., "Abstraction, Tendencies and Stylized Facts: a Realist Approach to Economic Analysi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9, 13, p.65.

⑰厄恩斯特·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多样性、进化与遗传》，第3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⑱贾根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纲领》，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4)，57页。

⑲米耶和西尔斯编：《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第40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

⑳个体认识的特异性是人类社会创造活动以及新奇事物出现的重要原因，

这揭示出“有限理性”的假定仍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①厄恩斯特·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多样性,进化与遗传》,第4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②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第278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③张仁德:《比较经济体制学》,第1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④艾登姆等:《经济体制》,第14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⑤Amariglio, J. et al., “Division and Difference in the ‘Discipline’ of Economics”, *Critical Inquiry*, 17(1), 1990.

⑥张仁德:《比较经济体制学》,第1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⑦这里的“历史”并非简单地指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把经济过程看做是不确定性的和不可逆的。参看 Ebner, A., “Understanding Varieties in the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Style”, in Groenewegen, J. and Vromen, J.(ed.), *Institu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1999.

⑧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第599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⑨Lawson, T., “Economic and Reality”, Routledge, 1997, p.57.

⑩转引自 Hodgson, G.M., “Structures and Institutions: Reflections on Institutionalism, Structuration Theory and Critical Realism”, Draft of 19 July 2000.

⑪Ebner, A., “Understanding Varieties in the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Style”, 1999.

⑫“格式塔”即“Gestalt”,可以近似地理解为“整体”的含义。

⑬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7页。批判实在论理论家和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似乎都不把技术和生态地理维度视做与个体能动性相互构成的结构因素(关于这个问题需作更深的研究)。陈平和笔者与批判实在论理论家一样,深受马克思的影响,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个人经验和知识所引起的对马克思文本的不同理解,关于生态地理因素作为结构性制约条件的论述可参看陈平(2000,引论)。

⑭这里的个体根据比较研究的对象而确定,包括个人、组织、地区甚至国家等。例如,国家相对于世界体系无疑在分析上可以处理为个体,国家的能动作用是导致世界体系在结构上动态转变的力量。



⑳context一词原义为“事物等发生的来龙去脉”，有时译做“脉络”，李康等在翻译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时译作“情境”，这些译法都把握了这个词某些重要的意蕴。然而，笔者认为，把这两种译法综合在一起，才能更全面地表达脉络(历史)和情境(抽象的空间)这两种含义，但笔者在行文中有时根据语境将单独使用这两种译法中的一种。

㉑Clark, P., *Organisations in Action: Competition Between contexts*, Routledge, 2000.

㉒鞍钢宪法是指“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大搞技术革新。

㉓贾根良《“鞍钢宪法”的历史教训与我国跨越式发展战略》，南开学报，2002年第4期。

㉔贾根良：《经济转轨中的文化传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2）。

㉕Niosi, J., “The Diffusion of Organisational Innovations: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in Groenewegen, J. et al. (ed.), 1999.



演化经济学与达尔文主义

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类比具有哪些严重的局限性？演化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转向生物学寻求灵感？而达尔文革命又是如何从经济学中获取灵感的？本章在讨论这些问题后，第二节将介绍霍奇逊和克努德森有关经济学中达尔文主义的最新研究，这种研究说明，社会经济演化的拉马克主义嵌入达尔文主义是没有矛盾的。对演化经济学来说，达尔文主义并不是生物学类比，而是本体论基础，演化经济学应该发展与达尔文主义相一致但又非常具体的经济演化理论。目前，达尔文主义经济演化解释框架的深入发展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把自组织理论纳入其中；二是它与现代流派的关系问题，本章第三节将对此有所讨论。

第一节 经济学的重大转向： 从机械类比到演化本体论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及其机械类比的局限性¹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开始陷入持久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简化论。例如，为了有效地进行均衡分析，引入代表性企业的概念，抹煞了企业间的差异和多样性，企业被简缩为一个点，采用牛顿力学的类比，通过类似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进行原子化的质点分析，这是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做黑箱的根源。虽然新制度经济学打开了企业的黑箱，但它仍受简化论思维的支配（如市场与企业两分法），忽视了丰富的多样性现实。又如把技术简化为生产函数和已制定好的蓝图，增长是通过新的生产函数的引入所导致的，但技术的性质、起源和变化过程却被束之高阁了。第二，还原论。新古典经济学遵循经典科学之方法，把复杂的经济整体还原为整体之和，长期以来缺乏宏观经济分析结构。凯恩斯革命之后，新古典主义通过形式化处理宏观经济分析之方法，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但却丢弃了凯恩斯革命的精髓。实质上，凯恩斯革命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是相冲突的。这种还原论的另一突出特征就是排斥对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研究，从而不能对部分和整体之间的交互作用给予深刻的说明。它不仅使肯德里克等在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时产生了生产要素无法说明的“余值”，而且也无法解释非线性正反馈与金融危机的关系问题。第三，决定论哲学观。新古典综合派形成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丢掉了凯恩斯关于风险、不确定性与预期这些革命性的思想。这种理论结构通过参数（偏好、制度和技术），通过系统各部分之间的数量关系，排除了随机和偶然因素，以一

种决定论的方法对有机的经济过程加以处理。

按照米若维斯克(Mirowski)的看法，新古典经济学上述理论结构是19世纪经典物理学给其在出生时打上的胎记。18世纪法国的拉普拉斯把这种决定论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信条是，只要给出足够的信息，我们就能预先确定宇宙中每个质点在任何时间的位置，这就是科学史上有名的“拉普拉斯决定论”。受经典物理学伟大成就的影响，19世纪初许多社会哲学家就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试图把社会科学建立成类似于数学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这种思潮在科学哲学上的反应就是实证主义，孔德写道，在知识的每一分支上，若要使我们的研究具有实证性，那就必须把它们范围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必努力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和最终结果。新古典经济学给定偏好、制度和技术的不变等假定就是这种科学哲学的反应。从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经典物理学的这种影响是无孔不入的，如瓦尔拉写道，“经济学的纯理论在每一方面都是类似于物理数学科学的一种科学”^②。帕累托也把决定经济均衡的方程看做是合乎情理的力学方程。即使对马歇尔来说，虽然“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是由于生物学的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类比性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含意”^③。

新古典经济学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的兴起史称“边际革命”。然而，正如杰奥尔杰斯库-罗金评论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④。目前，新古典经济学仍滞留于力学或机械类比，并通过经济学“帝国主义”向社会科学其他领域输出这种方

法。虽然凯恩斯革命受到量子力学的影响，在其理论架构中引入了整体性和不确定性思想，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革命，反而被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简化论和机械论思维所同化，因此，经济理论的危机势不可免。借用X-效率理论创始人莱本斯坦的话来说就是，不存在危机也应有危机。

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种研究纲领，其理论硬核包括个体主义方法论、理性最大化假定和决定论的均衡结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原子本体论，这种理论认为，任何实体所拥有的特征独立于与其他实体的联系，个体尽管在形态上不同，但却完全是同质的。虽然现代物理学早已放弃这种过时的世界观，但它仍是主流经济学的基础。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⑤。按照这种哲学本体论预设，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不是来自于对特定社会历史关系的抽象，而是源自一种先验的、普适的关于人性的假定。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对人的思想和行动是如何变化的并没有任何解释内容，它只不过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人应该如果行动的说教而已。认知科学最近十几年的研究得出的一些结论，如心智具有能动和组织化的性质，具有模块性功能以及认知具有层级结构等^⑥，完全否定了理性最大化的假定。但弗里德曼对此却辩解说，理论假定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产生“正确的预测”^⑦。然而，正如坎特指出的，“从来没有一门学科，像经济学这种假冒的‘科学’一样，胆敢做如此不可信的声音”^⑧。

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只有通过这种把经济现象非历史和非社会化，才能把经济学变成一种类似于经典物理学这样“精密的”实证科学。它把经济社会演化过程处理为由原子化个体事件所构成的一种封闭体系，不去探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深层因果机制，而是在先验假定基础之上，通过感性经验对现象形态上所谓的“规律性”进行逻辑推演。这种错误的根源正是源自实证主义的科学

哲学观，它没有看到科学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交互作用的因果依赖，没有看到作为社会产物的人类经验与知识所具有的历史暂时性。通过把科学中的概念、命题与定理永恒化，一劳永逸地把科学变成了一种拜物教，从而导致了双重的简化：因果律化约为事物间的固定关联，事件固定关联化约为个人经验。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这种“经验认识论与社会的个体主义本体论灾难性结合”^⑨的产物。

大量的证据清楚地表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仍是基于机械隐喻及其类比。杰奥尔杰斯库-罗金在上面所提到的“物理学惊人的革命”是指20世纪初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革命，它与耗散结构理论等一起构成了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重大进展。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本质上与达尔文革命具有某种一致性，它们都包含了有机思想及其思考模式。但由于达尔文在生物学中首先引入了这些革命性的思想，所以，我们使用达尔文主义总称这些世界观的变化，使用生物学类比泛指与机械类比相对立的思考模式，而不含有任何以生物学理论作为判断标准的看法。实际上，我们应该注意，与受简化论支配的主流生物学相比，现代物理学的许多重要思想对演化经济学可能更有启发意义。此外，由于生物系统比物理系统更为复杂，达尔文主义这个标签比现代物理学包容了更多的历史观，所以，对于思考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来说，它提供了更广泛的基础。正如施韦伯（Schweber, S.S.）指出的，“达尔文在重要的方面放弃了动力学解释的牛顿模式，提出了对生物系统动力学解释的一种新奇的概念化……生命系统无限地比牛顿的行星系统更复杂。生物因素具有在时间中所经历的变化：它们有历史。所有有机体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都不是附加的和瞬时的，而展示了记忆。正是物理学所处理对象的非历史性使牛顿的大纲具有简单的数学描述的可能性。确实，正是生命对象的历史特征使生物现象具有惟一的和复杂的特点”^⑩。

二、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从生物学类比到演化本体论

演化经济学发展的最初动机之一来自于演化经济学家们的信念：经济学应该更多地类比于生物学而非物理化学，他们自然会赞同马克思的看法，“经济生活呈现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①，不同意新古典的“经济学同物理学相类比则更为恰当”^②的看法。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源远流长，可以远溯至18和19世纪。在20世纪末以前，经济学与生物学的交互影响主要是通过隐喻和类比实现的，但目前对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来说，经济学家们在思想上已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进展：达尔文主义对经济演化的解释并非仅仅是类比关系，其本体论意义更为重要，正如梅特卡夫指出的，“演化解释内在的不是生物学解释，演化理论具有独立其应用领域的自身逻辑”^③。2002年，霍奇逊的一篇论文就直接使用了如下题目：《达尔文主义：从类比到本体论》。下面我们只概述这两个学科交互提供灵感的一些重要事例，达尔文主义的本体论意义将在第二节讨论。

在经济学对生物学的影响方面，没有任何事例比马尔萨斯《人口论》对进化论形成的影响更能说明问题了。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在1838年10月（也就是在系统研究15个月之后）我为了消遣，偶尔翻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已经有了一定的准备，可以正确认识生存斗争。我马上联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趋向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淘汰，这一结果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④令人惊奇的是，生物进化论的共同建立者华莱士也谈到了类似的经历，他在马来西亚患疟疾期间，“一天，某种东西使我回忆起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我是在12年前读到它的。我想到了他对缩减人口‘积极控制’的明确阐述，我那时想到这些原因或其类似的东西在动物情况下也持续地起着作用”^⑤。本书第二章我们谈到了通过隐喻和类比实现科学理论创造的回溯法，在这里，达尔文和华莱士生

物进化论的创立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除了马尔萨斯的影响外，曼得维尔、苏格兰学派和斯密等对达尔文革命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哈耶克指出，“文化演化的思想无疑比生物演化的概念更古老。甚至可能是达尔文通过他祖父的影响把它应用到了生物学，这来自于曼得维尔和休谟的文化演化概念，如果不是更直接地来自法律和语言的当代学派”^[9]。曼得维尔在《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中明确提出了分工的思想，提出了社会秩序和和谐来自于分散的个体追求自我利益的结果。曼得维尔对包括斯密及其朋友、哲学家休谟等在内的苏格兰学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霍奇逊指出，苏格兰学派作为整体用我们现在广泛地称做演化的术语分析了社会制度的突现和发展。一般认为，斯密和苏格兰学派给予并支持了达尔文的这种信念：复杂的现象能够产生于许多个体行为无意识的结果。曼得维尔-斯密对达尔文的另一重要影响是有关变异和分工的思想，斯密的分工理论与达尔文有关变异和物种突现的思想都是基于多样性和复杂性日益增加这种共同的世界观。

但总的来说，马尔萨斯对达尔文革命的影响是更根本的。达尔文革命的重要成果就是否决了自然与社会必然进步的观念，而这一变革的发生直接受到马尔萨斯的影响。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演化的和谐观和演化的不完善、矛盾观一直存在到今天，前者以曼得维尔和苏格兰学派为鼻祖，对曼得维尔等来说，邪恶既是必不可少的，又是社会上有用的，它导致了更大的良善与和谐；后者以马尔萨斯为先驱，马尔萨斯提出了与曼得维尔等相反的看法，首先，不存在最终的和谐，不可能存在完善的社会秩序，其次，不应在任何程度和形式上容忍邪恶。类似的观点也被马尔萨斯应用到了自然界中所存在的多样性、次优、差错和斗争。马尔萨斯看到，没有劣等部分或明显的瑕疵，自然界无限的变异就不可能存在。在演化的和谐观和演化的不完善、矛盾观之间存在着



一条鸿沟，它把和谐和完善的伊甸园与不纯粹、斗争和变化的冷酷之地分开了。达尔文跟随马尔萨斯做了进一步的超越，跨越了上述鸿沟，当经典分工理论谈论整体部分的完全适应时，对马尔萨斯和达尔文革命来说，甚至不完善和不和谐在系统中也起着积极的和赋予动力的作用，驱动着没有终结的转变¹⁹。

然而，达尔文革命对自然与社会必然进步观念的否决至今仍未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著名的进化论者、古生物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古尔德写道：“1959年，著名遗传学家穆勒抱怨道：‘这一百年没有达尔文也一样。’这一特别黯然的评价使当时参加纪念《物种起源》问世100周年的许多听众都感到震惊，但是没有人能否认这一失望中所表达的真理。为什么难以理解达尔文？不到10年，他就使思想界不再怀疑进化的发生，但他一生都没有使人们普遍接受他自己的自然选择理论。直到20世纪40年代，自然选择理论才被广泛接受。然而，即使在今天，虽然自然选择理论已经成了我们进化论的核心，但仍然存在对于自然选择理论的错误理解、错误引述和错误使用。问题并不在于这个理论逻辑结构上的复杂性……我还是相信阻碍接受达尔文理论的并不只是由于科学上的困难，而是由于达尔文理论中所含的基本哲学内容是对西方人心态的一种挑战，这种心态至今仍然难以被抛弃。首先，达尔文提出进化没有目的……其次，达尔文坚持认为进化没有方向，进化并不必然导致更高等事物的出现……再者，达尔文在解释自然中贯彻了唯物论的哲学。”²⁰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最大化和最优实际上就是社会必然进步观念的反映。在经济思想史上，凡勃伦1898年首次把达尔文革命引入到经济学，并批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些先验假定，但不久它的影响就消失了。演化思想的再次引入是由阿尔奇安在1950年的经典论文中做出的，但阿尔奇安和弗里德曼是在“最适者生存”这种信念下使用自然选择这个术语的，这与达尔文革命的思想是

相悖的。正如温特所观察到的，(演化思想)典型的应用变成了对利润最大化某种辅助性的辩护。“然而，当经济学家们常常通过使用演化类比为其最优论点提供正当理由时，隐喻的交流也再次反方向流动。进化生物学家论证了基因被处理为‘仿佛’最大化的实体，把经济学家们开发的工具引入进来的大门突然被打开。根据梅纳德·史密斯这样的进化生物学家的看法，某些工具在生物学中的使用可能要比经济学更好。特别是他认为，‘结果，博弈论在生物学中比其原初设计的经济行为领域更容易被应用’。”^[1]现在，隐喻交流的方向又颠倒过来了，演化博弈论目前已成为经济学中博弈论研究的前沿。笔者认为，由于演化博弈论未能彻底贯彻达尔文革命的精神，它在解释社会经济演化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但本书对此暂不讨论。

第二节 霍奇逊和克努德森论 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

我们在本书第一章指出，现代演化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生物演化是达尔文的，而社会经济演化则是拉马克的。在生物学中，拉马克主义被认为是不能成立的。然而，根据人类知识的统一性原理，一个领域的解释必须与另一领域的解释相一致，我们有可能既是社会经济演化的拉马克主义，同时又是生物演化的达尔文主义吗？如果有可能，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它们之间如何相统一？特别是道金斯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普遍达尔文主义”的命题：达尔文的某些基本原理可以应用于从心理学到宇宙论等非常广泛的领域，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观点的否定吗？这个问题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中一直悬而未决，霍奇逊和克努德森(Knudsen, T.)的最新研究^[2]解决了这个问题，社会经



济演化在一般意义上更是达尔文的，拉马克主义应该嵌入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是演化系统的一般理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要以此为基础。本节将介绍霍奇迹和克努德森的这些研究成果。

一、新达尔文主义、拉马克主义与达尔文主义

新达尔文主义是经典达尔文主义和孟德尔遗传学相综合的产物，所以它又被称为“进化综合论”，它是现代进化生物学的主导学说。经典达尔文主义关注的焦点是“有机体中心观”，而孟德尔遗传学革命则使新达尔文主义移向了“基因中心观”，因此把自然选择定义为基因型再生产的不同，它涉及两个独立的过程：遗传传递；后成的（epigenetic）表现型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这包括对基因型和表现型状态空间、遗传和后成过程以及遗传和后成过程关键性联系的描述。表现型是指实际展现（和可观察）的有机体特征，而基因型是指作为基础的信息集合，它包含着有机体赖以发展而非决定性的指令。

一般地说，新达尔文主义的焦点集中在变异、适应和遗传的过程，但完全排除了拉马克获得性遗传的可能。根据新达尔文主义模型，从体细胞到基因的遗传反馈由于魏思曼“屏障”被阻断，魏思曼“屏障”是指排除拉马克遗传的分子壁垒。在其现代形式上，魏思曼“屏障”转变成了中心法则，信息可以从DNA和RNA向蛋白质流动，但反向则不成立。在生物演化中，为什么获得性特征不能改变基因呢？魏思曼“屏障”存在的理由就是遗传密码不得不防止大多数外部的影响；否则有价值的遗传信息将被玷污或丧失。因为这个理由，遗传信息基本上不得不是惰性的和没有反应的。后来，英国生物学家沃丁坦（Waddington, C.）对基因的保守性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如果它能被所有类型的环境影响所改变，不久它就会成为停滞不前的无价值的东西。因此，拉马克主义与新达尔文主义的关键性区别是：拉马克主义认为，作为遗传基础的指令集（生物基因或社会规则）可以被修改并被遗传。而新达

尔文主义则认为不能被修改。此外，正如纳尔逊和温特以及免疫学家斯蒂尔（Steele）强调的，拉马克解释有一些可能的特征，如目的性、新变异的及时出现等。

克努德森概述了新达尔文主义的解释框架，他写道，基因型和表现型在进化生物学中是最基本的建筑板块，在任何时点上，生物群体的状态可以用表现型的分布状态和基因型的分布状态加以描述，但两者的变化必须联系起来。一种典型的观点是把它分为两个基本的和独立的亚过程：第一，由于表现型和环境交互作用所导致的不同生存；第二，通过基因型复制，表现型存留到下一代，所要阐明的就是变异如何经由自然选择并通过无数世代的累积效应所导致的演化。按照这种说法，演化既包括表现型的改变（新变异或新特征的扩散），又包括遗传世系的历史，因为除了表现型特征的改变外，就变异的起源来说，它也包括其历史，演化并不等于自然选择。这使恩德勒(Endler, 1992)把演化定义为一种过程，它包括自然选择和其他过程，如产生新变异的遗传漂变（genetic drift）。因此，演化解释包括两部分：（1）自然选择。（2）世代之间累积变化的历史过程。自然选择只取决于目前的生态和遗传条件，换言之，它是非历史的。而且，自然选择没有必要意味着演化，因为累积的遗传变异很有可能导致演化稳定均衡。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达尔文主义被看做是一种反对拉马克获得性遗传的理论。然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和其他著作中确实曾考虑过获得性遗传的可能性。霍奇逊指出，如果按照新达尔文主义过分狭窄和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来衡量，达尔文自己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达尔文主义者。霍奇逊和克努德森都指出，达尔文主义是一个更宽广的概念，它包括新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的可能性。拉马克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但两者却可以纳入到统一的达尔文主义框架中。霍奇逊认为，达尔文主义是有关复杂或有机系统演化的因果理论，它可以广泛地被

定义为建立在变异、选择和连续性（包括遗传）原理基础上的演化解释。克努德森写道，达尔文“通过自然选择的演化”这种核心思想只用“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带有饰变的由来）这三个英文单词就可以加以总结。根据杜海姆的看法：“带有饰变的由来”意味着任何系统的演化都要满足下列系统要求：（1）传递单位，（2）变异的来源，（3）传递机制，（4）转变过程，（5）孤立来源。按照这5种系统要求，演化理论意味着，“某种被遗传和被修改的东西〔需要（1）〕；这些东西被遗传的某种连续性机制〔需要（3）〕；某种修改过程，借此保证新奇和变异的某种来源〔需要（2）〕；孤立和非连续性的来源〔需要（5）〕允许差异在刚出现的子系统被积累，因此最终导致多样化。达尔文主义的这些系统要求没有与任何特定的遗传模型（无论是拉马克的还是新达尔文主义的）联系起来，它是演化解释所要求的一般性因果结构，可以被应用于所有演化系统，其解释力就在于它的完全性和一般性。

二、拉马克主义为什么要嵌入达尔文主义

由于达尔文主义解释框架的一般性，所以拉马克主义要嵌入达尔文主义问题。为什么？霍奇逊对此提出了以下两点理由。首先，拉马克主义假定，获得的并被遗传的新特征是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道金斯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写道，“获得性特征被遗传倒是挺好，可是并不是所有获得性特征是改进的。事实上，它们的大多数是有害的”，因此，有必要解释为什么不利的获得性特征没有累积到导致灭绝，也有必要解释为什么某些获得性特征是改进的。基本上，拉马克主义没有解释为什么改进而非损害被遗传。因此，对于任何能够站得住脚的拉马克理论来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都是必要的补充。从这点来看，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要相互吻合。然而，按照道金斯的看法推论，这两者的互补是非对称的，拉马克主义需要达尔文主义作为解释支架，反方向则是不成立的。其次，对于有机体为什么寻求对环境

的适应必须提供因果解释。拉马克假定它是有机体的目的所支配的，但对这种目的性的起源没有提出解释。拉马克理论存在着一个需要达尔文的或其他的解释所填充的空白。达尔文主义按照基因型随机变异的再生产解释了为什么有机体寻求对环境的适应，它也提出了对目的性和意图的演化解释。因此，即使获得性特征是可以遗传的，拉马克主义也再次需要达尔文主义作为解释支架。

总的来说，霍奇逊和克努德森都认为，拉马克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相互排斥的，拉马克主义对获得性遗传的发生没有提供因果解释，所以拉马克主义应嵌入达尔文主义。然而，这种嵌入会不会对达尔文主义产生威胁？霍奇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如下阐述。19世纪9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鲍得温(Baldwin, I.)和英国生物学家摩根独立地提出了在达尔文框架内解释快速演化步伐的问题。当时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因为拉马克主义者对达尔文主义提出的反对是：如果没有获得性遗传，演化的发生就太缓慢和杂乱无章了。拉马克主义者声称，达尔文主义有关变异的“盲目”和“随机”原理不能解释生物演化的速率和效应。鲍得温和摩根为了驳斥拉马克主义者，提出了没有获得性遗传的演化也可以加速的观点，这被称为“鲍得温效应”。1969年，沃丁坦复活了这种思想，并把它命名为遗传吸收理论，其基本看法是：获得性特征不能被遗传，但这并没有排除获得某种特征的能力的遗传。例如，如果我们从事手工工作，我们的手掌就会变厚。虽然我们的孩子没有被遗传额外变厚的皮肤，但通过基因，我们把手掌对手工工作做出反应从而变厚的能力传递给了后代。随着时间推移、考虑群体作为整体，自然选择将有利于皮肤增厚的遗传倾向，相应地，获得性没有直接被遗传，但通过自然选择，获得那种特征的能力在作为整体的群体中却提高了。

霍奇逊认为，这种遗传吸收理论在微观传递层次上没有破坏魏思曼“屏障”，与达尔文主义是相一致的，而且它也没有对生物

学中的拉马克主义给予支持，实际上，它发展的原动力是对拉马克主义的反对。然而，遗传吸收理论在宏观或群体层次上却产生了一种新的“突现”特征。因为获得增厚皮肤的能力随时间推移提高了，所以，我们在群体层次上能观察到更快和更广泛的皮肤变厚的扩散。在群体层次上，突现的特征和过程具有“准拉马克”特征，但它不涉及微观个体层次上的拉马克遗传。

遗传吸收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启示。第一，群体层次上“突现”特征的存在警告我们，不要急于把拉马克主义的标签应用到社会经济演化上，从宏观层次上看似拉马克遗传的在微观层次上可能并非如此。第二，遗传吸收理论显示了复杂系统的层级本体论，在不同本体论层级上，存在着不同种类的演化过程，这需要特定的理论，但相互之间不能存在矛盾。达尔文主义提供了这样一种适应性非常强的一般性理论框架，被称为“普遍达尔文主义”。

三、普遍达尔文主义

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的，但在一般意义上更是达尔文的，这个结论与道金斯所提出的“普遍达尔文主义”是一致的。道金斯认为，如果生命存在于宇宙中其他的地方，它也将遵循达尔文的变异、遗传和选择原理。即使存在着非常不同的遗传系统，包括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对演化过程的连贯解释仍将需要达尔文理论的关键性要素。只要一个群体具有不完全遗传的特征，而且这种遗传并不都是具有生存的潜能，那么，达尔文演化将发生。齐蔻 (Cziko, 1995) 意味深长地把这种对“普遍的选择理论”的承认描述为“第二次达尔文革命”。按照这种观点，达尔文演化并不只限于基因，其本质是需要某种遗传机制。在地球上，DNA 具有复制能力，但是，其他“复制者”可能在地球上或其他地方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例证是，人类交流、适应环境和模仿的行为使习俗、惯例、习惯和思想的复制和遗传成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关键特点。

所以，自然选择²⁰和演化的达尔文主义不应被看做是为生物学特定的目的所发展的概念，而是为生物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所提供的一种新的概念结构和框架。因此，对演化经济学来说，达尔文主义并不是生物学类比，而是揭示了社会经济实在的一般特征，换言之，达尔文主义对演化经济学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普遍达尔文主义是反简化论的，强调“层级上结构化的演化理论”，这是与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是一致的。简化论可以被定义为这种观点：复杂现象的所有方面都必须按照某种基本的层次来解释，不存在独立的分析层次和它所赖以建立的“突现”特征。简化论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和生物学，在经济学中，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是简化论的突出表现，“寻找宏观经济学坚实的微观基础”这种提法也反映了简化论的精神；在生物学中，遗传决定论是简化论的典型代表。

作为反简化论的普遍达尔文主义具有以下两种含义。首先，它不像贝克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推行的“经济学帝国主义”那样，试图用单一的一套原理完全地和排它地解释广泛的现象，相反，普遍达尔文主义认为，各学科领域必须发展其特定的和辅助的解释。其次，普遍达尔文主义反对用生物学术语解释所有的现象。达尔文演化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所涉及的过程总是遗传上的变异和选择。当遗传演化存在时，这并没有排除在额外本体论层次上对不同实体产生作用的额外的演化过程。“层级上结构化的演化理论”意味着在生物和人类社会等每一层级上都存在着不同的选择单位，较高级别的演化不能完全用低层级上的演化过程来解释²¹。

因此，对社会经济演化过程及其“突现”特征，普遍达尔文主义并没有提供详细的因果解释，演化经济学必须发展与生物学等领域相当不同的、具体的和特定的理论。许多演化经济学家已注意到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在机制上的不同，霍奇逊做了如下总结。例如，与DNA复制的高精确度相比，习惯、惯例和制度

这些社会经济的复制者就其自身来说是不完全的复制。社会经济选择不只是在代际之间发生，而且，它也是在社会经济单位的生命期产生的，社会经济演化中的选择没有必要总是涉及某种选择单位的灭绝。自然演化中的世系典型的是分离的和趋异的，而在社会中，世系间存在着信息的传递、结合乃至趋同。与自然中大多数选择所发生的环境长期稳定相比，社会经济选择的环境常常是快速变化的。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存在着拉马克获得性遗传的可能，而在生物遗传演化中这基本上被排除了。

因此，演化经济学必须在达尔文主义的指导下发展变异、复制和遗传的相关概念，深化社会经济演化机制的研究。

第三节 经济演化解释框架 与现代流派问题

目前看来，相对成熟的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还有待于创造。笔者认为，这样的一种框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如何把自组织理论纳入到更深刻的达尔文主义框架之中，这种框架可能与目前的达尔文主义框架有所不同；第二，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一般的达尔文主义框架也有所不同，特别是它能把目前演化经济学中有助于经验研究的学派统一起来。目前本书无法解决这两个问题，只能提供相关研究背景，一是介绍自组织理论；二是从新奇这个本体论入手，确认最低限度上与达尔文主义框架相一致的现代流派。

一、深入研究自组织理论

自组织理论是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它主要是由贝塔朗菲、普利高津和哈肯等人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所创建的。普利高津等人创建了非平衡热力学的布鲁塞尔学派，该

学派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在自组织理论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结果是产生了广义进化论。追溯历史，我们知道，当牛顿的经典力学完成其综合之时，它就受到了经典热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挑战。与经典力学不同，这两种理论或学科都强调了自然演化和时间的重要性，但“时间之箭”的方向却是相反的。整个19世纪科学家们都陷入了这两种对立方向“时间之箭”的困惑之中，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问题才经由耗散结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普利高津等对物理规律很少谈及时间、进化和不可逆现象深感惊奇，深信自然界遵循统一的规律，他们从濒于死亡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入手，挖掘这一定律关于时间和不可逆过程的深刻含义，基于封闭和开放系统的区分，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

从热力学观点来看，耗散结构是指在远离均衡态的情况下，热力学系统有可能出现的一种稳定的有序结构。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经典热力学研究的是处于或接近均衡的封闭系统。在封闭系统中，如果最初不是处于均衡，热力学第二定律将驱使系统达到以最大可能混乱和随机为特征的均衡态。但如果系统是开放的和逐渐远离均衡的，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在接近均衡的区域，如果内部和外界引起涨落的因素是线性的，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组织结构。相反，如果系统处于外界各种因素的强相互作用之下，具有非线性的动力机制，系统行为就处于在多重稳定态（分叉）之间进行选择的相变（转变）过程之中，这种新的分叉的增加代表着系统演化的多样性和组织结构趋于复杂。一个非常小的扰动或涨落通过非线性机制有可能导致系统从偶然事件走向必然，使系统从不稳定状态走向新的稳定有序状态。系统的发展可以经受突变，系统在分叉点的驻留和犹豫呈现出混沌之特征。因此，约瑟夫·福特说，进化是具有反馈的混沌。分岔点区域系统行为的非决定性，表明了大自然所具有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混沌理论把这种因素与系

统内在的决定性机制巧妙地结合起来，说明了在秩序和混沌的边缘，大自然创造性演化过程的内在本质。总而言之，耗散结构是在开放、非均衡条件下，通过非线性、自动催化（正反馈）和系统的涨落而形成的自组织或自维生系统。

一般说来，自组织理论主要描述的是动态系统中多个独立组成部分如何交互作用最终导致了某种秩序的突现。自组织系统需要具备五个方面的特征：（1）热动力学开放性。自组织要不断与外部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否则，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系统最终将达到最大熵值状态，走向“死亡”，即热力学均衡。（2）局部交互作用。这主要指系统内部微观个体间的交互作用。在正反馈这种放大机制下，个体间局部交互作用的微小差异可能对系统产生很大的影响。（3）个体间交互作用的非线性。系统内部包含多重反馈环，有正反馈和负反馈。自组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系统的循环反馈机制。因为系统在到达预定目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干扰，从而偏离预定路线。只有依靠反馈机制，不断调整系统的发展方向，才能实现目的。（4）突现的产生。这是指高级复杂现象能够自发地从低级组成部分的交互作用中产生。自组织系统内存在多重的规模效应：小规模交互作用产生宏观层面上的有序结构，后者再进而影响和修正小规模的活动。（5）系统内部的涨落和外部环境的干扰对系统的稳定性构成持续的“威胁”。如果一种结构变得不稳定，新的结构将产生。在自组织过程中，连续性（生存）和变化（适应性演化）被有机结合起来了。

当自组织理论被应用于社会经济演化过程时，必须回答两方面的问题：首先，社会经济演化的自组织所具有的含义。它与自然科学有何不同？其次，社会经济自组织产生的机制。社会经济活动的推动力是什么？循环反馈机制又是什么？

与自然科学中局部交互作用产生宏观结构相类似，社会经济自组织是指自组织产生于行为者的交往之中。社会的动态性体现

为人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自然和社会现象都可以运用自组织原则进行研究，重要的是，在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找出社会经济活动的推动力和循环反馈机制。

社会经济自组织源于社会的复杂性，即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社会非线性动力学的根源。在社会经济自组织过程中，为了降低人们之间交往的不确定性行为产生的风险，作为长期博弈的结果，人们自愿共同遵守合作的社会规则。然而，风险不会被完全消除，因为合作中会不断产生新的冲突，从而要不断调整原有规则。而且，合作行为的规则是在解决具体问题中达成的，当情况发生变化时，原有规则就不适用了。所以，规则只是将不确定性降低到某一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上，外在的干扰和内部的涨落会不时激活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新的合作产生。因此，社会经济活动的推动力就是社会中的不确定性。最初，个体间局部的交往要求有局部的规则控制不确定性，当不确定性超出了局部规则的调节能力，就需要有更大范围的规则进行调节，直至最终产生全球性交往模式。在这一模式所允许存在的不确定性限度内，社会交往及其结构会保持一种动态的稳定状态。这即是社会经济自组织过程中局部交往导致社会秩序的突现。

社会经济自组织表现出以下几方面明显特征：（1）社会经济自组织的结果是产生合作的规则。（2）社会的动态性不同于自然。社会中的不确定性不仅受社会环境影响，而且还受个体的利益、知识和能力等主观因素影响。（3）社会经济自组织是一个动态过程。社会交往和社会结构是一种动态均衡。社会的稳定以能消除内部的涨落和外部干扰为前提。如果干扰或涨落过于强烈，社会经济自组织能适应这种变化，形成新的稳定形态。这即是社会内部正、负反馈交互作用形成的循环反馈机制作用的结果。

二、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

笔者认为，如果只从理论工作的角度来看，演化经济学新框



架的发展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参与达尔文主义一般框架的创造,另一方面要利用演化经济学已有研究传统所提供的基础。然而,演化经济学目前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标签,除了我们在第一章所提到的六种经济学分支或流派外,高迪(Gowdy)²²提出了以阿尔奇安、费里德曼和贝克尔为代表的“新古典演化经济学”这种观念。对于那些把演化经济学看做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学家来说,“演化”这个概念在使用上的混乱无疑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正如生物学家莫诺在一次讲演中所指出的,演化理论(另)一个奇怪的方面是每个人都认为他理解了它。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试图对演化经济学加以定义,并在90年代中期导致了演化经济学的划分标准之争。

1995年9月,在荷兰举行的“比利时-荷兰后凯恩斯研究协会”第十六届年会上,霍奇逊和弗罗门(Vromen)就演化经济学的划分标准问题展开了争论。霍奇逊认为,如果一方面人们把“演化”看做是清楚的和很好被定义的经济研究的方法,而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演化”的糊涂概念,没有比这更能产生混乱并阻碍智力进步的。他举例指出,演化经济学家们典型地被他们的智力史所迷惑,如纳尔逊和温特在他们的著作(1982)中忽视了凡勃伦开拓性的工作,虽然他们现在纠正了这个过失。但在霍奇逊1993年出版了演化经济学思想史的著作《经济学与演化》之后,兰洛斯(Langlois)²³等在他们涉及学科历史的论文中仍在忽视凡勃伦。为了弄清“演化”概念的含义并认真考虑这个概念的历史,霍奇逊1993年曾按照“系统发生论”和“个体发生论”的标准对使用演化方法的经济学家进行分类²⁴。在这次会议上,他又提出了另一套分类的四个标准,这就是:(1)本体论标准,是否强调演化过程中的新奇性和创造力;是否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时间不可逆。(2)方法论标准,是否采用简化论的做法。由于方法论个

体主义是简化论的主要表现，所以，简化论与否也就是是否强调在个体之上存在着突现的制度等结构特征。(3) 时间标准，在承认渐变的同时，是否考虑突变的重要作用。(4) 隐喻标准，是否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或者是否反对主流经济学的机械隐喻。从这个标准出发，霍奇逊认为，只有凡勃伦、康芒斯、罗金、纳尔逊、温特、霍布斯甚至凯恩斯等包括在内²⁶。

与霍奇逊对演化经济学严格划界的做法相反，弗罗门认为，演化经济学不应限制聚集在其旗帜下的经济学流派的数目，他反对把演化经济学看做是与新古典经济学所代表的任何东西相对抗的这种看法。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对“正统经济学”中的“演化经济学先驱”进行了考察，这包括（新）奥地利学派²⁷、“社会生物学家”和“芝加哥经济学家”。在“正统经济学”的这三个分支中，只有（新）奥地利学派致力于替代新古典经济学，其他两个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捍卫者。其中，“芝加哥经济学家”就是指高迪提到的“新古典演化经济学”代表人物阿尔奇安等。这些“芝加哥经济学家”运用“自然选择”的生物学理论，论证了经济演化过程可以产生新古典的结果。弗罗门指出，用自然选择论证理性决策绝不是与进化生物学相异的，弗里德曼对新古典行为假定的“仿佛”理解反映在社会生物学家道金斯有关论述中²⁸，“芝加哥经济学家”的论述最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与演化经济学相异的。因此，弗罗门认为，演化经济学不应排除新古典经济学，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新古典演化经济学的存在。他最后的结论是，演化经济学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它把正统理论中处于背景状态的演化力量和机制放在了核心地位，演化理论可以被看做是经济变迁的一般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其特例。按照弗罗门的这种看法，演化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的关系犹如相对论、量子力学等与牛顿力学的关系。所以，按照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弗罗门也应该承认，演化经济学仍可以被看做是经济学的“范式革

命”。笔者认为，弗罗门论文的目的是为了强调经济思想发展的包容性和某种连续性，反对用经济演化理论完全替代新古典经济学。

然而，新古典传统的“芝加哥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的演化经济学吗？笔者认为，按照我们在第一章提出的新奇这个本体论标准，芝加哥经济学家就必须被排除在演化经济学之外。阿尔奇安在其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指出，最大化行为没有必要用行为者的动机来论证，而是“进化”的竞争力量将使接近于最大化模型所预测的企业生存下来。在阿尔奇安看来，我们不需要关心企业的动机以及他们如何决策，他认为这与解释“自然选择”的竞争过程无关。因此，阿尔奇安虽然指出了把标准的微观经济理论扩展到不确定性情况时所存在的困难，但他明显地看低了有目的行为这个概念的理论地位。对弗里德曼来说，虽然明显地独立于阿尔奇安，但他在其经典论文《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中，也求助于“自然选择”论证了以下两个论点：第一，市场竞争倾向于保证最有效率的企业生存下来；第二，最有效率企业的行为“仿佛”是在使其利润最大化，无论他们是否有意这样做。贝克尔更是相信用“自然选择”论证最优化模型的正确性，以至于他后来声称，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科学分析的惟一基础。

然而，正如罗斯彼所指出的，他们当中甚至没有一人暗示过经济学家们应该研究一下选择过程的发生所需要的条件。据此，罗斯彼对这三位经济学家拙劣的生物学类比提出了系统的批评^⑧。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早已指出，芝加哥经济学家运用“自然选择”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捍卫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弗罗门等所提出的新古典演化经济学这种观念是不能成立的，它混淆了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性分歧。

现在看来，霍奇逊和弗罗门之间的演化经济学划分标准之争并没有解决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问题。笔者虽不赞同弗罗门把

演化经济学扩大到它所反对的新古典经济学上，但也不同意霍奇逊过于严格的划界办法。因为按照霍奇逊的标准，我们不仅难于理解熊彼特与“新熊彼特”的关系，而且也排除了奥地利学派对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所提供的不可或缺的重大思想。事实上，在弗罗门提出异议后，霍奇逊在其编辑的《演化经济学的基础(1890-1973)》(1998)一书中只强调了新奇和非简化论的标准，他把遵奉凡勃伦、熊彼特和哈耶克传统的经济学家包括在其中，从而扩大了入选的范围，但仍排除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而且，霍奇逊这本书并未考虑到1973年以后的发展。

笔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是对各流派的批判性吸收，它不应要求各流派完全符合创造性综合所要达成的目标。因此，新奇作为必要条件就足以成为区分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标准了。按照这个标准，笔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主要是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所构成，而复杂系统理论和演化博弈论主要是作为研究工具被发展的，不能称做学派。更重要的是，复杂系统理论和演化博弈论很少关注经验性的研究，对新奇的突现更深入的历史性探讨不感兴趣，热衷于数学建模，对笔者这里提出的发展一种经验性的新演化经济学帮助不大，所以，本书以下两章集中讨论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而对这两种分支暂不涉及。

注释：

①本章利用了作者早先论文的部分材料，参看贾根良：《进化经济学：开创新的研究程序》，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3)。曾有2002年的一本著作整段地搬用了拙文而未注明出处，如果读者发现本书与之有雷同的段落，那是因为两者都出自拙文。

②Hodgson, G.M., *Economics and Biolog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5, xiii.

③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18-19页,商务印书馆,1964。

④Georgescu-Roegen, N.,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2-3.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⑥参看Paul Twomey, *Reviwing Veblenian Economic Psychology*, *Cambria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 22, pp.433-448.

⑦参看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见《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页。工具主义科学观阻塞了科学进步的可能性,因为按照恩格斯的看法,科学进步表现为假定向真实的逐渐逼近。此外,解释而不是可预测性是科学赖以建立的基础,实证经济学的科学观早已被自然科学的进步所否决。

⑧参看Kanth. R.K., *Against Economics: Rethinking Political Economy*, Avebury Publishers, 1997, p.34.

⑨参看Kanth. R.K., *Against Economics: Rethinking Political Economy*, Avebury Publishers, 1997, p.17.

⑩转引自Hodgson, G.M.,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Ontolog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2, 6, pp.262.

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3页。

⑫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5页。

⑬Dopfer, K (e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Progress and Scop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p.49.

⑭转引自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第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⑮转引自Nicita. A. and Pagano, U. (e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Diversity*, Routledge, 2001, p.2.

⑯转引自Hodgson, G.M.,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Bringing Life Back into Economics*, Polity Press, 1993, p.57. 有关哈耶克贬低马尔萨斯对达尔文的影响、贬低达尔文原创性的问题,霍奇逊也在该书中探讨了个中原因。

⑰Hodgson, G.M.,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Bringing Life Back into Economics*, Polity Press, 1993, pp.64-68.

⑮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序言第1-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⑯Nicita, A. and Pagano, I. (e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Diversity*, Routledge, 2001, pp.5-6.

⑰Laurent, J., and Nightingale J. (eds.) *Darwin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1.

⑱克努德森指出,“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非常不同的选择概念在科学中被使用。这两个概念都是一般性的概念,完全没有特定的生物学内容。第一个概念是子集选择,它是指按照某种偏好标准,从一种集合中选择要素的一个亚种集合,如家庭主妇从当地市场出售的苹果中所进行的选择。第二个概念是达尔文选择,在达尔文选择中,后代不是父母代的子集。达尔文选择应用于复制中的群体,在其中,连续性是由遗传所保证的,而子集选择应用于连续性是由子集同一性所保证的群体。在达尔文选择中,每种复制都有创造新变异的可能,而子集选择排除了新变异的可能性。因为这个理由,具有潜在无限演化的生物和社会系统都可能涉及复制过程”。Knudsen, T., *Economic Selection Theor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2, 12, pp.444-445.

⑳Hodgson, G.M.,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Ontolog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2, 6, pp.270-273.

㉑Gowdy, J., *Topic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Spring 2001, jgowdy@ol.com.

㉒Langlois, R. N., Everett, M.J., “what is evolutionary economics?” in Magnusson, L. (ed) *Evolutionary and Neo-Schumpeterian Approaches to Economics*, Kluwer, 1994.

㉓Hodgson, G. M.,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Polity Press, 1993. 拙文《进化经济学:开创新的研究程序》曾简要地介绍了这种分类法,参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3)。

㉔Hodgson, G. M.,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s”, in Reijnders, J. (ed),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7.

㉕笔者并不同意把“(新)奥地利学派”列入“正统经济学”的范围,因为长期以来它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者。

㉖Vromen, J. J., “Evolutionary Economics: Precursors, Paradigmatic Propositions, Puzzles and Prospects”, in Reijnders, J. (ed),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7, p 46.

⑧Loasby, B. J., "Selection Processes in Economics", in Dopfer, K. (e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Program and Scop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I）

第一节 老制度学派

与新制度学派近年来在国内盛行一时的状况相比，人们对老制度学派大都沿袭了传统的看法：它是一个庸俗的和无足轻重的学派。由于人们有可能因新制度学派对老制度学派产生“连带”兴趣，商务印书馆于1997年重印了凡勃伦和康芒斯的代表作，但重印时仍保留的原有评论则是很不恰当的。目前国内发表的关于老制度学派寥寥可数的几篇文章大都缺乏从新的角度加以评论。当然这种状况也有例外，参看张宇燕(1993)和贾根良(1999)。这种看法又因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的著名评论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科斯认为，虽然老制度学派中“都是一些智商发达的人，但是他们是反理论的；同时他们缺乏一个理论将他们所收集的事实整合起来，他们并没有什么能够传流下去的东西。”^①然而，如果对老制度学派特别是其创始人的著作进行仔细检查，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看法与事实不符。本节认为，虽然老制度学派未能像新制度学派那样提供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乏重大的理论价值。作为一种“异端”学派，它不仅哺育了主流学派某些重大学说的形成，而且笔者认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与科斯的看法相反，它有可能对新制度学派未来发展的方向提供必要的营养^②。因此，当人们

开始对新制度学派某些内在缺陷日益加深理解之时，有必要重新评价老制度学派。

一、老制度学派的起源

关于老制度学派的起源问题，本节将借助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加以分析。皮亚杰认为，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所谓建构是指主体与客体在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认知结构。主体对外部客体的认识过程包括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认知机制，一种机制是同化机制，即当外部刺激对人的感觉和思维发生作用时，主体无须对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予以内部调整和改变，就能在思维中对此加以吸收、同化和包容，完成对客体对象的认知。另一种机制称做结构改组机制，即当主体的认知结构对某种特异的外部刺激不足以同化时，主体必须对自身的认知结构进行内部调节、补充和改组。从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出发^③，本节以老制度学派最早的奠基者凡勃伦为代表，从主客体两方面对此加以考察。

从外部环境来看，凡勃伦的思想形成于美国内战结束后迅速的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无论是正式的或有形的制度安排如土地和工商制度，还是非正式的或无形的制度安排如道德意识和文化价值观都经历着剧烈的变迁，无疑这对老制度学派的诞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学者注意到凡勃伦和康芒斯出生于美国并在美国中西部长大，从而具有“边疆”之“根”，简单地把老制度学派看做是“边疆运动”在经济学思潮中的反应，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无论是在美国中西部还是东部，19世纪最后30年迅速的工业化过程都充满着混乱和动荡，农民的抗议与工人运动不断发生，阶级和阶层利益冲突剧烈。这在凡勃伦的思想形成上产生了三点值得注意的影响。第一，凡勃伦最初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极大兴趣，使凡勃伦的方法与马克思具有强烈的亲缘关系，但那种否认凡勃伦的独创性、并认为凡勃伦的思想只不过是披上美

国的和技术的外衣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相反，那种把老制度学派看做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新方法和新形式”，也是简单和片面的^④。第二，政治经济冲突的两极分化“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凡勃伦为什么倾向于用对立的两极这一概念来思考”^⑤，从而形成了金钱就业与工业就业、既得利益与工艺操作的划分，这是目前老制度学派关于制度与技术两分法的起源，这一两分法对老制度学派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三，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历史上所谓的“镀金时代”。资产阶级暴发户的精明强干和粗俗不堪，导致凡勃伦在其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对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抨击。这说明凡勃伦虽然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土壤之中，但却与当时社会“流行的思想习惯”格格不入，也许正是这种“气质类型”导致凡勃伦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叛逆者。

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说，虽然理论家的思维过程与普通人并无差异，但其思维所使用的概念首先要来自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在这方面，凡勃伦对所有重要的经济学家的著作都极为熟悉。因此，当美国迅速工业化所导致的种种冲突对凡勃伦的思维发生作用时，他发现传统经济理论的思维结构无法对此加以吸收、包容和认知，这促使他不得不创造新的概念体系并重构经济理论的思维框架。实际上当他有意识地这样做之前，经济理论新的认知结构的“原始影像”在他大学时代就已形成。追溯凡勃伦制度学说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原始影像”是由达尔文演化论和实用主义哲学所提供的。凡勃伦1880年在卡林顿学院毕业后，进入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哲学。就学期间，临时来讲授逻辑的讲师、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皮尔斯对凡勃伦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凡勃伦关于制度的定义直接源自皮尔斯所谓“思想的全部功能就是产生行为习惯”。当凡勃伦转学到耶鲁大学时，他对萨姆纳所宣讲的斯宾塞的进化论产生了浓厚兴趣。1890年，实用主义哲学家、美

国心理学奠基者詹姆斯发表的《心理学原理》被证明对凡勃伦和许多同时代思想家的影响是持久的。詹姆斯像凡勃伦早先的老师皮尔斯一样是斯宾塞进化论的批评者，他拒绝效用主义，提出了建立在本能和习惯基础之上关于人性的新理论。

然而，凡勃伦早在大学时代就种下的学术思想种子，只有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892年—1906年)时才在经济学领域中生根、发芽，并结出果实。在芝加哥大学，他与哲学家杜威、社会学家托马斯、生物学家洛珀等人之间的学术交往使他大受鼓舞。正是在这种学术环境中，1896年，英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摩根(C. Lloyd Morgan)访问芝加哥大学时所作讲演或同年发表的《习惯与本能》使凡勃伦的思想迅速成形。摩根同样反对斯宾塞的演化论，并论及经济社会演化的自主性，这使凡勃伦苦思冥想出了这样的观念：社会的制度结构不仅像摩根所认为的那样是经济社会演化的环境，而且作为环境的制度本身也像有机体一样在演化过程中经受选择。这一观念对凡勃伦说是革命性的。霍奇逊认为，从1896年至1898年间凡勃伦的思想经历了一场革命^⑥，他对经济世界新的认知结构终于建立起来了。以《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为标志，他从阅读和撰写书评为主转变成思想具有原创性的著作家，其成果反映在1899年发表的成名作《有闲阶级论》中，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因此而诞生。

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到1898年发表《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为止，凡勃伦终于建构起了认识经济世界的一种新框架。如果从他进入霍普金斯大学读哲学时算起，其间经过了近20年的时间，对人的一生来说，这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时期。其间，凡勃伦的思想一直在有机地发展着，终于在1896年至1898年间孕育了一场思想上的革命。第一，逐渐地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斯宾塞演化论及其生物简化论和决定论决裂。我们知道，这些理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流

行一时负有很大责任。因此，目前我国重印凡勃伦著作时仍存留的下述指责是不正确的：“凡勃伦把庸俗演化论搬到经济科学中，把社会发展规律和生物演化规律等同起来”^②了。第二，凡勃伦深受当时实用主义哲学和心理学的影 响，并创造性地加以发挥，他的制度学说就建立在当时这种崭新的心理学基础之上。通过经济学与生物学、心理学以及人类学和文化史的杂交，凡勃伦终于提出了经济学的一种新范式。从现代科学哲学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五花八门的大杂烩”^③。相反，笔者认为，它是继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中意义更为深远的一场革命的开端。

不破不立，凡勃伦这种新范式的形成过程也是他对传统经济理论内在缺陷不断加深理解的过程。他在许多著述中用辛辣的语言诋毁了已被接受的经济学理论，以至于人们有了这种印象：推翻经济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中的传统观念已成为他的事业。他对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学派、新古典主义和奥地利学派都进行了攻击。关于德国历史学派，凡勃伦认为，虽然它强调了影响经济行为的历史和制度因素，然而，“耗尽历史学派精力的广博学问和研究，并没有上升为科学，虽然它是坚实的，但它使自己满足于数据资料的罗列，满足于对产业发展的叙述性说明，没有打算提供任何理论或把其结果精练成逻辑一致的知识体系”^④。针对历史学派的失败，凡勃伦指出，他所宣称的演化经济学应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关于过程的理论，一种逐渐展露序列的理论。”^⑤从这段引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把老制度学派看做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一个变种”^⑥是不正确的。即使像熊彼特这样的经济思想史大家也认为“制度主义只不过是德国历史学派方法论的错误”，^⑦那么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认为老制度学派没有理论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是理论经济学长期忽视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种恶果。实际上，凡勃伦不仅宣称要创造一种新理论，而且也这样做了。

在进化论新思维的烛照之下，凡勃伦深刻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所基于的牛顿力学方法论之缺陷^⑩。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从物理学中所借入的静态和均衡思想是基于事物“始终如一趋向某种唯灵论合法结局”这个原则，按“正常状态”总是趋于均衡来思考，把“事件间超出归因倾向的因果关系”看做是“扰动因素而忽略不计”。来自经典物理学的这种决定论哲学观不仅与现实严重脱节，而且它力图实现的理论目的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它的假设是创新发生时创新的生存必须具备什么条件，而不是研究创新的各种生长条件^⑪。凡勃伦写道，“问题不是事物如何在‘静态’中自我稳定，而是它们如何不断地生长和变化”^⑫。然而，这种隐喻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新制度学派的许多作家仍沿袭了这种均衡分析方法，因此凡勃伦的下述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对此仍是适用的，“通过使用这种隐喻，理论家能心安理得地不去探究一连串难以捉摸的因果序列。不用转而说明活生生的生活，除了很方便地对其关于症候的标准化框架(用材料)加以确认外，他也能毫无疑问地构建关于货币、工资和土地所有权等制度的理论”^⑬。

凡勃伦根据心理学的最新发展(凡勃伦对这种心理学也有贡献)，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定，这种假定沿用了早在几代人以前就被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所接受的陈腐思想，即边沁的效用(享乐)主义原则。他对“经济人”假定的冷嘲热讽在经济思想史上是非常著名的。“享乐主义关于个体的概念是将人视做闪电般地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他像一个追求快乐的摇摆的同质的小球，外界的刺激使他移动，但不会使他有所改变。他既没有前因又无后果。他是一个孤立的、确定的人类已知数，除了冲击力使其在不同方向移动外，他始终处于稳定均衡态。他在空间上自我驱动，绕着自己的灵魂轴心对称地旋转，直到外界力量强加于他，使他不得不屈服。当这些作用消失之后，他又成了一个和以前一样静止的、不易冲动的欲望小球。”^⑭这种批评实际上是新制度

学派的先声，相形之下，科斯对“理性经济人”的批评似乎就不如凡勃伦这样深刻。而且，新制度学派另一代表人物威廉斯从西蒙那里借用的“有限理性”直接或间接地从老制度学派中获得过灵感²⁹。

三、老制度学派范式的硬核

按照拉卡托斯科学革命的理论，科学研究的纲领是由纲领不变的硬核和可变的保护带两部分所构成，只有硬核要素的改变才意味着一种新的研究纲领或范式的形成。一般认为，理性最大化、稳定性偏好和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构成了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范式的硬核³⁰。凡勃伦不仅对新古典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抨击，而且试图代之以一种新的理论硬核。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以简化的方式与新古典硬核的三种要素加以对比。

老制度学派在否定“理性最大化”假定的基础之上，提供了一种关于人性的新理论。新古典主义把人性看做是呆滞的和不变的，而凡勃伦依据演化论和新的心理学提出人性是演进的，是与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它们是他的遗传特性和过去经历之产物，是在既定的传统、习俗和物质条件下累积形成的”³¹，这就是本能和习惯假定的由来。凡勃伦认为，人性由六大本能倾向所组成：操作本能、父母的天性、闲散好奇心、关心自我、获取的倾向和习以为常的天性。对于每个个体来说，这些本能倾向互相交织对行为产生影响。然而，虽然本能是遗传品质，但它不是不可改变的。凡勃伦认为，因为生活的本能目的是在给定文化条件下产生的，换言之是以过去几代人的经验为基础的，所以它要受制于习惯的发展并由习惯而修正。与目前主流学派用理性解释习惯相反，早期制度主义者认为次序恰好是颠倒的，因为有意识的选择虽然在社会规定借以内在化的习惯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但许多可观察的行为往往是无意识适应的结果。实际上，当理性很大程度上受到习惯的巨大影响的同时，许多习惯常常是“非理性的”，因而对于

解释人类行为来说，本能和习惯的假定比理性假定更为基本。

新古典范式采用的是一种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虽然许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也承认个体的偏好或需要是可以改变的，但为了经济分析的目的，他们却假定偏好函数是给定的。与此不同，老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无论是其创始人凡勃伦和康芒斯，还是当代著名人物缪尔达尔和加尔布雷思，都认为个体偏好并不能总被看做是给定的。凡勃伦甚至认为，个体偏好可以发生剧烈的变化，“不仅个人行为被他与群体中其他人的习惯性联系所包围和引导，而且这些联系，作为一项制度的特性，随制度场景的改变而改变。需要与愿望，结果与目标，方法与手段，个人行为的变化与趋势，都是制度变量的函数，而制度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及整体不稳定性”^④。

那么偏好是如何形成和改变的呢？笔者认为，凡勃伦试图从两方面对此加以解释，一是上段引文已指明的：个体偏好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塑造，它是文化的产物；二是个体偏好的改变也受所谓“闲散好奇心”的支配。闲散好奇心是一种理解事物和建构系统性知识的本能驱动，正如凡勃伦指出的，虽然人像所有动物一样受本能和习惯支配，但人在智力上能领会指导其行为之习惯的要旨，评价其本能倾向和习惯的趋势。因此，闲散好奇心的本能导致了对知识的追求，它可以内在的改变对事物或世界的看法。以上这两方面交互作用，共同演进，不仅导致个体偏好发生变化，并且有可能最终导致社会流行思想习惯发生改变。

对于新古典均衡分析结构来说，正如霍奇逊指出的，“所有过去伟大的经济思想的叛逆者，包括马克思、凡勃伦和凯恩斯，都试图扩展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使之不仅仅纠缠于均衡推理”^⑤，凡勃伦的贡献是最早提出用演化论替代均衡观。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相反，凡勃伦认为，恰恰正是这些方面应成为(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因为经济变化是由“人类的力量”所造成的，这种“人类的力量”即“人类的知识、技能和偏好”。

换言之，它们“实质上是流行的思想习惯”，即凡勃伦所谓的制度。“演化经济学必定是一种由经济利益决定的文化增长理论，一种用过程本身来说明的经济制度累积变化的序列”²³。在这里凡勃伦提出了“累积因果原理”，后来凡勃伦又进一步指出，演化科学的基本原理是累积因果序列的观念。累积因果原理的提出，说明凡勃伦试图用一种系统的、动态的和整体的分析结构替代静态均衡结构。这在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中得到了更明确的阐释²⁴，它不仅成为老制度学派方法论的突出特征之一，也是其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

四、为什么说老制度学派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老制度学派范式的硬核是否形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从而成为经济学革命的新开端？目前对这个问题还不能得出完全肯定的结论。但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这些硬核要素的合理性或被重新发现，或得到了有力的复兴。

图迈（Twomey）通过把皮尔斯、詹姆斯和凡勃伦的心理学说与最近15年发展起来的认知科学²⁵之结论进行了对比，得出了如下结论：尽管凡勃伦的经济心理学在某些细节上可能是不正确的，目前研究认知的学科在心理和思维的精确性质上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但后者正开始重新证实凡勃伦关于人性假定的某些核心思想。心智具有能动和组织化的性质、具有模块性的功能，以及认知具有层级结构，这些结论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定，而且使凡勃伦的范式与现代科学研究取得了一致，“这给使用凡勃伦‘本能与习惯’术语的经济学家提供了勇气，不用害怕被指责为‘武断’了”²⁶。同时它对于发展老制度学派中关于知识和学习的理论也具有重大意义，从而为研究偏好的变化提供了新的基础。总之，与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包括新制度学派）相比，它为理解经济过程提供了一种更深刻和更广阔的概念框架。

几乎在重新证实凡勃伦心理假定的现代性的同时，作为凡勃



伦以及老制度学派重大理论之一的“累积因果原理”，通过路径依赖和报酬递增理论得到了复兴。霍奇逊证实，作为报酬递增理论家，阿林·杨格深受凡勃伦对“累积因果原理”再三强调的影响，在1928年那篇经典论文^②中运用于对报酬递增问题的处理。这一原理同样给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以深刻影响，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凡勃伦这一思想通过杨格不仅对早期发展经济学重大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③，而且布莱恩·阿瑟正是通过阅读早期发展经济学文献和杨格的论文，与现代生物学理论相杂交，提出了路径依赖和锁定的概念。而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却是从布莱恩·阿瑟和保罗·大卫那里借入路径依赖之思想，推广为对制度变迁进行研究的。学术传统上的这种承续关系非常明显，怎么可以说没有什么理论留传下来呢？

科学史上重复发现的例子屡见不鲜，除了社会文化等因素，可能是因为修辞术语上的原因，人们往往忽视先驱者的贡献。霍奇逊在纪念凡勃伦演化经济学专集的引言中指出，第一个提出交易成本概念的是凡勃伦而非科斯。凡勃伦的著作也突出地强调了知识和学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以看做是知识经济研究的先驱。康芒斯的思想中蕴涵着合约中非对称信息这一现代概念，而米切尔为库兹涅茨等所研究的国民收入账户及核算奠定了基础。几位研究者已注意到老制度学派与凯恩斯经济学的亲和关系，霍奇逊甚至认为，“沿着制度主义者的路线，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就存在着基础”^④。霍奇逊所谓制度主义者主要是指继承早期老制度学派传统的经济学家。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老制度学派产生重大影响地发现。老制度学派间接或直接地哺育了某些主流学派重大学说。

反观新制度学派，由于它只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及其制度约束修正了传统新古典主义的保护带，仍保留了理性（有限理性）、均衡和偏好不变这些硬核要素，因而不能称之为经济学革命。正

是因为这个原因，新制度学派在用个体主义方法研究制度变迁时就陷入了无法解脱的困境，这可能是促使诺斯引入路径依赖思想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诺斯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发表的讲演，似乎正在日益皈依老制度学派的范式。诺斯关于信仰结构、路径依赖和文化重要性的论述，几乎是老制度学派的价值结构、累积因果和文化演进的等价物^⑧。威廉斯在谈到新制度学派目前的研究课题时指出，它需要在社会镶嵌结构（societal embeddedness）和人性（the attributes of human actors）这两大背景条件方面加强研究，前者与习俗、道德和宗教等文化要素有关，后者则应吸收认知人类学、组织理论和演化心理学的成果^⑨。科斯在《我的新制度经济学观》中也注意到生物学和文化因素对制度研究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凡勃伦的研究要比他们早了一个世纪，因此对新制度学派这种新的发展方向来说，老制度学派可以提供必要的借鉴，新制度学派虽然前途无量，但范式的转变似乎不可避免。

老制度学派重大的理论价值还在于凡勃伦是现代演化经济学当之无愧的先驱。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的危机之中，一些经济学家把演化论引入到经济理论之中。1981年博尔丁出版了《演化经济学》，尼尔森和温特发表了极富影响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从而使演化经济学成为20世纪最后20年社会科学中最重要和最激动人心、并取得重大进展的学术领域。实际上，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最早是由凡勃伦在创立制度学派时所提出的，随后被老制度学派后继者所采用。在他们看来，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是等价的，并于1965年成立了“演化经济学会”。纳尔逊和温特在其名著中所提出的作为选择单位的基因类比物——企业惯例，实际上是凡勃伦关于制度是生物学基因类比物的翻版，当然这并不否定纳尔逊和温特的独创性。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迅速发展，使凡勃伦许多关键性的思想得到了更清晰的表述，人们越来越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强调老制度学派的重大理论价值并不意味着，在发展一种替代传统经济学的新框架上，老制度学派所做的工作是成功的。实际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老制度学派虽有一些极富启发意义的理论构造^⑧，但总体上来说其状况是令人不满的。经济学家们对老制度学派兴衰的原因已做了许多分析，从这个学派自身来说，凡勃伦最富创造性的工作是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随后他的思想发展基本上就停止了，其著述的风格也越来越粗糙，而这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是很少看到的^⑨。所以凡勃伦从未发展一种后来由摩根、亚历山大和怀特海等建立的“突现”演化哲学观。这不仅对凡勃伦的事业来说是悲剧性的，而且对老制度学派来说也是灾难性的，这是导致老制度学派走上文化决定论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⑩。老制度学派的后继者忽视了这种理论工作的艰巨性，并抛弃了凡勃伦所倡导的与生物学密切相联系的传统。凡勃伦的理论中所存在的一些内在缺陷也使之放弃了这种努力，经验主义占了上风，老制度学派越来越变成出类拔萃的资料收集者，这是导致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老制度学派衰落的内部原因。只是近十几年来，它才开始注意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汲取营养，从而显示出理论复兴的趋向。因而，重视老制度学派的理论价值，其意义还在于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复它已有的错误。世纪之交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已初露端倪，老制度学派理应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节 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经济学是演化经济学两个最古老的传统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充满着各种矛盾，但总的来说，门格尔的原创性贡献奠定了迄今为止奥地利经济学发展的基础。但自庞巴维克开始，门格尔的原创性贡献逐渐被遗忘，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们才

能在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作中看到奥地利学派原创意识的重现，它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导致了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复兴，产生了柯兹纳和拉赫曼等当代重要的代表人物。然而，拉赫曼的激进主观主义对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宗旨提出了挑战，并使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突现为明确的研究方向。现在，奥地利学派能否经受这种突变并做出新的贡献，仍有待于深入的观察。本节首先介绍对奥地利学派性质的不同认识，然后概述从门格尔的原创性贡献到奥地利学派复兴的历史脉络。在此基础上，我们只集中讨论拉赫曼对奥地利学派的贡献。最后将对奥地利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未来做出简短的评论。由于篇幅所限，本节对奥地利经济学的介绍和研究是非常初步的和不全面的，只是突出了笔者认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奥地利学派的一些重要特征。

一、奥地利经济学共同的方法论基础

奥地利传统在经济学的园地中可谓一枝奇葩，它孕育了许多对经济科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除了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和米塞斯以外，还有熊彼特、哈耶克、哈伯勒、马克卢普（Machlup, F.）、摩根斯坦和罗宾逊等。福斯在《奥地利学派与当代经济学》（1994）中写道，现代经济学中许多最令人感兴趣的思想，如产权、不对称信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过程等，都可以在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作中找到其渊源。福斯认为，如果奥地利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的见解不是被凯恩斯主义和瓦尔拉主义席卷而去的话，经济理论将会以更健康的方式取得更快的进步。

我们不禁要问：奥地利传统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至于1997年沃恩（Vaughn, K.）在奥地利经济学发展协会的主席讲演中谈到，被奥地利经济学所吸引的年轻经济学家们禁不住用它不是什么——不是数学的、不是凯恩斯的、也不是均衡的——而不是用它的独特之处来思考。确实，由于奥地利经济学发展过

程中各种观点的冲突和复杂性，人们对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常常莫衷一是，人们常常用它的一些特点来概括：它不是数学的；常常是哲学的；经济活动的动态性质是关注的焦点；它超越市场交换和生产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

奥地利传统难以确认的困难就在于其思想的演进展示了许多悖论，葛劳蕊简短地总结了奥地利经济学的这种历史。奥地利学派是由19世纪末著名的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所开创的。尽管门格尔对瓦尔拉发展有某些谴责，但他通常仍被看做是与瓦尔拉和杰文斯共同开创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的人，以至于他的独创性贡献被吞没在他与之保持距离的传统之中。第二代奥地利学者是以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为代表的，虽然他们声称继承了门格尔的遗产，但庞巴维克的利息和资本理论却被门格尔看做是“所碰到的最大错误”，维塞尔的国家干预主义也与奥地利传统的自由主义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目睹了不只一个悖论，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虽然门格尔强烈地反对把数学引入到经济学中，但维也纳为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运动提供了最初的舞台。战后，在奥地利经济学的复兴中，米塞斯和哈耶克被看做是主要的灵感来源，但他们两者在方法论上是不相容的。柯兹纳和拉赫曼是当代奥地利复兴的主要领导人，虽然他们也声称了同样的起源，但他们对市场过程的认识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⑧。

既然奥地利经济学难以统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充满着各种矛盾，那么它又如何被认为存在着一种传统呢？对于这个问题，贝特克（Boettke, P. J.）指出：“在奥地利学派内部尽管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有某些共同特征成为这个思想‘流派’的标签。奥地利学派提出的一套基本问题以及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反映了共同的东西。在这个传统中，经济学家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按照有目的的人类行为理解经济现象；其次，经济学家们必须追溯这些行为的无意识结果。为了完成这些工作，奥地利学派认为应

该遵守三项基本的方法论宗旨：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以及理论的注意力放在过程上而不是均衡上，这是自门格尔以来，奥地利学派统一的工作与方法。”³⁶我们下面就总结这三项基本的方法论宗旨。

主观主义是奥地利学派最突出的方法论原则，也是它们研究人类行为总的途径，该学派许多独特的看法正是来自主观主义。哈耶克在1952年甚至写道，在过去的100年，经济学中的所有重大进展都是在主观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上取得的。奥地利学者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对外部物质和社会世界具有感觉、理解和知识，并用来指导和塑造行为。作为个人所采取的行动，他对外部世界的理解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信息匮乏和认知能力的限制，都是在他主观认知情况下做出的。如果我们不考虑人类的感受、知识和计划，我们就不能了解人类行为的意义。因此，主观主义的核心要点是：社会科学解释必须从行为者的主观心理状态出发，这需要社会科学家认真对待情境和理解的作用，认识到正是行为者的主观感受驱动着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客观的现实构成了这种状态的基础。奥地利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一般均衡理论决定论的效用最大化没有为真正的主观行为留下任何空间，在这种理论中，行为者实际上不存在真正的选择。

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最初是由熊彼特在1908年命名的，其含义是所有的社会现象原则上只能用个人的特征、目标和信念来解释。对哈耶克和其他奥地利学者来说，自发秩序的演进是由个人主观感受所驱动的行为无目的的社会结果，因此，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主观主义的必要补充。方法论个人主义这种立场最初是由门格尔在与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之争中提出的，他认为国民经济这种现象是个人经济努力的结果，理论上也必须按照这种看法来解释。方法论个人主义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反对，最常见的反对意见是个人不是作为孤立的原子而存在，他嵌入文化环境之中。

针对这种反对意见，米塞斯提供了经典的辩护：“人们的大多数日常行为简单的是惯例……他做许多事情是因为孩提时代被训练做这些，因为其他人采取同样的行为方式，因为这是他所处的环境中的习俗。他获得习惯，发展了自动的反应。但他沉溺于这些习惯只是因为其效果受欢迎，一旦他发现惯例性的行为方式阻碍了他更渴望达到的目的，他就改变了他的态度……人类行为学不关心行为变化的内容，但关心它的纯粹形式和它的范畴结构。人类行为的偶然和环境特点的研究是历史学的工作。”^⑩

市场过程而非市场均衡是奥地利学派第三个方法论原则。奥地利学派的市场理论是指基于私有产权和自愿交换的社会秩序理论。这与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不同，后者是有关某种市场结构的行为与绩效的理论。奥地利学派对市场持有一种过程的概念，市场过程是由制度框架所维系的自发秩序，它是在个人行为者面对局部无知和变化不能预料的情况下通过交互作用而“突现”的。葛劳蕊认为，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可以用三个相继序列的结果综合地来表述：个人计划的对抗；计划修改；调整的结果。奥地利学派认为，以均衡为基础的“帕累托最优”作为规范标准具有严重的缺陷，它没有考虑到信息缺乏和知识等问题。新古典的市场均衡观和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观可以对比如下。第一，市场均衡观认为在个人行为者的计划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协调，计划也与作为基础的偏好、技术和资源一致。市场过程观认为至少某些行为者的计划之间是矛盾的，与作为基础的数据不一致，虽然局部协调在市场上保留了某种程度的连贯性。第二，市场均衡观认为所有变化都是可预测的，排除了真正的错误、懊悔和惊异。市场过程观认为行为者的知识是不完善的，经历着错误、不可预料的变化、懊悔和惊异。第三，市场均衡观认为均衡价格起支配作用，它确保了个人之间计划的一致以及与作为基础的数据的一致。市场过程观认为，存在着非均衡价格，它反应了不协调，但标明了

有利可图的计划调整的机会。第四，市场均衡观认为给定交易成本，市场把资源配置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市场过程观认为，错误的存在导致无效的资源配置，市场过程将趋于修正它⁸。

二、门格尔的原创性与奥地利学派的复兴

虽然我们上面简述了奥地利经济学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但这并不能掩盖人们对奥地利学派的性质在观点上所存在的深刻分歧。例如，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复兴的三位代表人物就代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把奥地利学派看做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柯兹纳认为，他的工作就是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它所丢失的经济过程理论，奥地利的企业家理论为均衡经济学提供了非均衡的基础。第二种是把奥地利学派看做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替代。拉赫曼认为，主观主义从价值扩展到预期将完成门格尔在19世纪70年所开始的经济学革命。第三种则把奥地利学派看做是更宽广的社会理论，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复兴的第三位代表人物罗思巴德(Rothbard)就试图把奥地利学派建立成关于自由的跨学科的社会理论。

从历史角度来说，人们对奥地利学派的性质所存在的不同看法由来已久，其中第一种看法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占据统治地位，因为当时奥地利文献中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被囊括在新古典主义之中了，门格尔的原创性贡献完全被忽视了。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奥地利学派的复兴，奥地利学派的原创意识逐渐增强，第三种看法也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那么，如何对奥地利学派的性质做出判断呢？由于奥地利经济学内部的多样性和折中主义的存在，对奥地利传统一般特征的概括就有丧失其特定性和原创性的危险。因此，葛劳蕊的新著《奥地利经济学的演化：从门格尔到拉赫曼》提出从门格尔的原创性出发，把奥地利学派确定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替代。她的基本理由是，门格尔无异议地被接受为奥地利经济学的奠基人，奥

地利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声称继承了他的遗产。葛劳蕊的这种思路确实有道理，奥地利经济学的三项方法论原理就是由门格尔确立的。依笔者之见，葛劳蕊实际上是从拉赫曼对门格尔精髓的创造性阐发入手，回溯了门格尔的原创性，并用这种线索研究了从门格尔到奥地利学派复兴的经济思想史，本部分所概述的主要是葛劳蕊的这种研究成果。

目前，在门格尔对经济学的贡献问题上，经济学家们至少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看法，也是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目前惟一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门格尔与瓦尔拉和杰文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位共同创立者。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门格尔的经济学强调的是基于边际效用的价值原理，是资源配置经济学的典型例证。1972年，斯垂思勒（Streissler）对这种传统的看法首先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门格尔的贡献是在生产的逻辑上，据说门格尔重新开启了斯密在《国富论》中开始的研究纲领。不过，门格尔用信息获取过程作为行为者福利增加的手段取代了斯密的分工原理。葛劳蕊反对新古典主义的看法，同意斯垂思勒的观点，但又认为这种看法并没有抓住门格尔的原创性贡献，因此她提出了第三种观点：门格尔的目的是要理解复杂经济现象的起源和演化，对经济制度结构的理解是门格尔的主要目标^①。门格尔区分了两种制度类型：“有机”制度和“实用”制度。这里的“有机”制度并不含有生物学类比的意义，而是指那些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但不是人类设计的制度，如货币、市场、交换价格、语言、共同体和法律等，“实用”制度则是指有意识设计的社会组织。门格尔认为，理论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理解“有机”制度的起源和变化，而不研究“实用”制度^②。

为了理解复杂经济现象的起源和演化，门格尔提出了一种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当不同的研究思路，葛劳蕊对比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分歧。首先，就边际原理和数学工具来说，门格尔发展了一种

并不局限于连续和可微分的边际效用概念。正是因为这个理由,门格尔认为,对于理解人类行为来说,数学方法完全不能获得在他手中边际主义革命试图揭示的经济现象的实质。其次,门格尔提出了目前经济学研究前沿的许多问题,这是其他边际主义创始者所不具有的,如不确定性、行为者的判断错误、经济活动的暂存维度、现象的非决定论和信息不完全等,这些因素最适合于过程而非均衡分析。最后,边际主义革命也常常被称做主观主义革命,但门格尔的动态或“激进”主观主义与新古典的静态主观主义存在着深刻分歧,它并没有局限于偏好而是扩大到预期、成本和时间概念上,对个人选择的机械和最大化概念提出了挑战⁴²。

事实上,门格尔当时就清楚地意识到了他与其他边际主义创始者之间的不同。例如,瓦尔拉给门格尔曾写信说,通过他们之间的合作,可以看到一个注定要存在的学派的出现,而瓦尔拉自己和门格尔就是最著名的教父。针对瓦尔拉热情洋溢的来信,门格尔的回答无疑会使瓦尔拉很扫兴:“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类似。但这是在某些点上的概念类比而不是在决定性的问题上。”⁴³

葛劳蕊总结了门格尔的原创性贡献:“第一,作者发展了一种动态的主观主义观念,它把经济行为者看做是对环境的行动者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被动反应者。主观主义对所有复杂经济过程的分析来说构成了基本的解释基础,而不是以任何方式限定于需求方面。第二,因果关系主义的方法拒绝了与均衡逻辑相关的静态和预先决定的观点。经济系统的最终形态取决于活动实际发生的途径而不是初始条件。与新古典经济学对给定均衡出现的条件分析不同,重点放在了对经济现象的突现过程的理解上。第三,使用函数分析这种数学工具清楚地反映了适合于均衡分析的经济系统的观念,它把经济行为者的机械观念作为解释的出发点。采用动态主观主义,并对理解现象的突现过程感兴趣,就涉及拒绝函数关系和联立方程,更一般地拒绝形式化方法。”⁴⁴



然而，根据葛劳蕊的研究，自庞巴维克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门格尔的原创性贡献逐渐被忽视了，虽然维塞尔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例外。葛劳蕊分析了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和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是怎样偏离了门格尔的逻辑的，分析了奥地利形式主义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对门格尔遗产的背叛。葛劳蕊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为奥地利学派的复兴埋下了伏笔，虽然他们没有立即就意识到他们所讲的是一种与新古典不同的语言，但正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对抗后来刺激了奥地利学者原创意识的唤醒^④。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哈耶克论知识在经济学中作用的论文和米塞斯1949年《人类行为》的著作的出版，奥地利学派原创性贡献的明确意识出现了，米塞斯提出了人类行为公理，而哈耶克论证了知识扩散的原理，这两个基本原理为20世纪70年代奥地利学派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最终导致了门格尔遗产的重新发现。

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学生，他们两者都声称忠实地发展了门格爾的经济理论，然而他们在方法论上却存在着难以融合的冲突。但是，奥地利学派现代复兴的学者们发现，他们两者在发展动态主观主义方面以一种不同但又互补的方式做出了贡献，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公理和哈耶克的知识扩散原理可以被综合。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公理很简单，它的含义就是人类行为是有目的的行为。定义虽简单，但它清楚地把门格尔和新古典对主观主义的定义区分开来了。米塞斯通过对经济过程中暂存维度和企业家作用的分析，展示了人类行为公理所包含的因果关系、真实时间和不确定性这些丰富的内涵。葛劳蕊认为，哈耶克的知识扩散原理在1937年的经典论文中就有所显露，但只是在1945年，哈耶克才清楚地表达了理解奥地利学派的关键：竞争就是知识的发现和扩散过程。哈耶克强调了竞争过程和市场机制在分散的、主观的和意会的知识协调过程中的重要性。人类行为公理和知识扩散原理在奥地利学派

的现代复兴中以不同的方式被接受下来，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支流，它们分别代表了对奥地利学派性质的不同认识：罗思巴德完全按照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方法深化了人类行为公理的后果，但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柯兹纳综合了这两个原理，但丢失了时间和不确定性因素；拉赫曼通过沙克尔的“万花筒”实在观解释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贡献，并超越了两者的局限，代表了对门格尔原创性贡献最彻底的发展^④。

三、拉赫曼的激进主观主义

拉赫曼（1906—1990）是与哈耶克同时代的德国人，通过发展其他奥地利学者所丢失的要素，把主观主义扩展到个人预期，对主观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拉赫曼在德国接受教育。20世纪30年代初，当他来到伦敦经济学院时，他直接接触到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和奥地利人、发展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罗森斯坦·罗丹向他指出哈耶克的理论在主观预期问题上所存在的空白。这种印象在拉赫曼阅读凯恩斯的《通论》时被强化，他强烈地认识到，对于理解投资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预期的影响，这就是他的主观主义旅程的开始。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拉赫曼对经济学中的数学形式化进行了激烈的抨击。1943年，拉赫曼在《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中的预期》这篇论文中，十分鲜明地提出了他所发展的主观主义方法论基础的主要宗旨，后来的论著基本上是对这些胚胎思想的详述。

可以这样说，拉赫曼虽是德国人，但却是20世纪70年代奥地利学派复兴的“先知”，正如玻穆指出的，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除了米塞斯，没有其他人会自觉地把他自己看做是奥地利学派学者。在拉赫曼随后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沙克尔和马克斯·韦伯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拉赫曼的激进主观主义，他在奥地利学派的现代复兴中被看做是挑毛病的人，其影响也不是很大，但他把主观主义思想发展到第三个阶段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贡

献。

在奥地利经济学的发展中，主观主义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主观价值、主观知识和主观预期。第一个阶段是从门格尔开始的，奥地利学派把它称做维也纳主观主义革命。门格尔创立的主观价值论不仅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且与新古典经济学也不同。门格尔认为，经济行为者的偏好在市场的两个侧面都是主观的，而新古典经济学只认识到需求方面的主观性，对供给方面则采用了客观的生产成本或机会成本的概念。然而，奥克勒认为，虽然主观价值论在门格尔的经济理论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但就主观主义对经济学的宽广意义来说，它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就所有经济现象作为个人决策、选择和行动的产物来说，它所具有的主观性质和起源则是门格尔主要著作的焦点⁴⁶。但是，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不幸的是门格尔没有足够持久地追求这种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是：价值的主观性需要知识的主观性。拉赫曼把主观主义范式定义为试图按照行为者的内在意义来解释经济现象。拉赫曼认为，在纯粹的门格尔逻辑上，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工作完全适合于这种文本，他们试图解释经济现象怎样从个人计划的交互作用中突现出来。对他们来说，个人计划是在他自己主观知识的基础上制定的，行为者的知识得自于他个人对他所能处理的知识的理解，因此，市场过程的动态性质起源于随时间推移的知识扩散、修正和主观获取的方式。因此，米塞斯特别是哈耶克的分析被理解为经济学中主观主义范式演进的第二个阶段。

按照拉赫曼的看法，主观主义扩展到个人预期是主观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作中，拉赫曼发现了存在着这个第三个阶段的充足前提。葛劳蕊追溯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作对拉赫曼激进主观主义范式形成的影响，她写道，米塞斯

《人类行为》的第一章为拉赫曼考虑预期的主观性质提供了第一个重要的见解。尤其是在第五章有关人类行为暂存性质的论述中,米塞斯引入了柏格森的时间概念,它的直接后果是把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与行为的结果联系起来:每种行为都涉及未知的未来,都是一种具有风险的投机。但米塞斯从未提到预期,也没有追究投机的后果,拉赫曼通过利用他从沙克尔的“万花筒”世界观所获得的灵感发展了米塞斯的思想。对拉赫曼来说,哈耶克对知识的分析处理了预期,但只是在静态意义上,它排除了个人计划形成时想像和推测的作用。个人计划的不同定义是拉赫曼与米塞斯-哈耶克-柯兹纳等传统奥地利学者产生分歧的关键。按照哈耶克的想法,个人计划只是经济行为者对过去经验主观理解的知识,它是经济行为者的主观主义展示其自身的惟一要素。拉赫曼对个人计划的定义则增加了第二个要素,这就是表现为对未来想像的预期。未来是不可知的,但不是不可想像的,个人计划是心理活动的产物,在个人计划的形成中,预期即对未来的想像所起的作用不会小于有关过去经验的主观理解。根据米塞斯的看法,预期就是内在于人类行为中的投机部分。按照这种理解,拉赫曼扩大了个人计划的概念,它包括对作为对过去经验主观理解的知识 and 预期。然而,就第二个要素来说,拉赫曼注意到,在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作中,预期在整体上被处理为预见(能力)的一种方式,这是完全知识的一个相当不幸而又不可避免的结果⁴⁶。对拉赫曼来说,主观预期考虑到了选择的创造和想像性质,它包含了知识不再简单的是发现而是创造的问题,这是主观知识的定义所不具备的。因此,当哈耶克使奥地利学派从主观价值移向了主观知识,拉赫曼则进一步移向了主观预期。

主观主义扩展到预期对市场过程的分析具有势不可挡的结果。“市场被描述为以不可预料的变化和计划的不一致为特点连续过程。后一特点不是数据的外生变化的结果,而是主观预期的内生

产物。个人计划是不同的，因为主观预期是建立在行为者对将来想像的基础上的。竞争可以导致相关知识的扩散，但不能导致正确预期的扩散。主观预期不能以任何方式被扩散，因为每一个个人在每一时点上可以对未来经济状况有不同的想像，可以作为想像能力的结果修改他或她的计划。”因此，一旦选择的创造和想像性质及其他对市场反应的多样化行为的含义被认识到，奥地利学派还怎样能够假定市场过程将趋于均衡呢？均衡和非均衡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拉赫曼著作中的这种“万花筒”市场过程观被人们称做“激进的主观主义”。

激进的主观主义不仅挑战了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市场观，也对奥地利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非干预主义的政策规范提出了疑问。在经济理论的发展方面，它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如果市场行为是多样化的和不确定的，自门格尔以来奥地利学者所追求的普遍的市场理论可能就是一种幻想，经济学家们进行经济预测的范围就大大地受到了限制、预测的能力必然要受到怀疑。因此，传统奥地利学派对拉赫曼的看法是非常矛盾的，因为它不仅提出了上述那么多挑战，而且更对市场自发演进的个人主义观念提出了疑问，但这种疑问又是其传统自然演进的结果。葛劳森对此评论说：“拉赫曼的分析是从奥地利传统的大多数人广泛接受的一套命题开始的。主观主义扩展到个人预期与奥地利思想的任何基本原则都是不矛盾的。相反，按照哈耶克的想法，它显示为一种异端范式的形成。米塞斯和哈耶克在他们的研究中，没有考虑这个维度这种事实是一个谜而不是分析上的不相容。在奥地利逻辑中考虑预期的性质导致了分析上的后果——市场过程无法趋同——这是传统奥地利学者几乎从来不能赞同的。一种真正的‘蝴蝶效应’！”^⑩

四、简短的评论

葛劳森对奥地利经济学现代复兴的三种理论思路进行了比较，

她指出，“结论被证明是相当惊人的：奥地利传统在它的现代版本上看来要接近终结了。按照我们的观点，实质上能软化这种相当悲观主义结论的一条途径是发展拉赫曼的思想路线”⁹⁸。拉赫曼的思想路线就是发展一种解释个人计划形成过程的制度理论，拉赫曼早在1970年的著作《马克斯·韦伯的遗产》中就写道，在我们自己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我们的计划的成功间接地取决于成千上万的其他人的行动，我们方向性的规划怎样为我们提供坚实的指导？答案必须在制度的存在、性质和功能中去寻找。

然而，拉赫曼在发展一种能够容纳个人能动性的制度理论方面并不是很成功的，这项工作被一些新一代的现代奥地利学者接受下来了，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985年出版的《时间和无知的经济学》。该书的基本假定与拉赫曼是一致的：人类行为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个人是在对选择相关的某些条件无知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在这些假定下，作者展示了人类行为的混沌和“纯粹决定论”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制度能降低行为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影响预期的形成，对行为者认知的差别起到限制作用，使行为者能发现自己行动的道路。

1997年，沃恩在奥地利经济学发展协会的主席讲演中，特别提到“时间和无知的经济学”，她认为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奥地利经济学性质的争论富有成效的答案。对奥地利经济学的未来来说，她的看法是：如果把奥地利经济学确认为“时间和无知的经济学”，那么下一步就是把它转变成具体的命题，使之成为指导实际经济研究的正面启发式论据（positive heuristic）。沃恩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⁹⁹。首先，认真考虑时间意味着我们不可逃脱地在人类行为的所有解释中纳入人类学习。当奥地利经济学文献充满了有关学习的隐含论述时，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学习的情境与可能做出的发现之间的关系。一个有前途的研究领域就是调查人类认识到这种因果关系的途径，即人类通过实验和模仿学会采用的战

略、做事的方式、惯例和解决问题的范式。其次，研究习惯和惯例怎样变成有目的行为的一部分、它们是怎样发展的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导致了变化。最后，由于制度是“依事而定的”，所以研究制度结构中的学习将不可避免地对真实世界中的事件给予更多的关注。为了奥地利学派研究纲领的发展，沃恩建议大家都应成为应用经济学某种当代问题的专家。

从沃恩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两点。第一，如果把奥地利学派与老制度学派的研究主题做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者的趋同。葛劳蕊在她的著作的结论部分讨论了这个问题，她认为老制度学派的许多东西可以丰富奥地利学派对制度理论的探讨，在经济协调这个特定的问题上两者是互补的。无疑，两者都有独特见解，但也都有片面性。如奥地利学派批评老制度学派把制度的突现和力量与它们来自于个人行为者主观感受的基础分离开来，忽视了主观主义的洞察力，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拉赫曼的激进主观主义突出了创造或新奇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性，奥地利学派的市场演化理论也具有理论价值，特别是拉赫曼的“不同的心智思考不同的事情”值得进一步研究。然而，如果没有新的框架，两者在互补中得到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第二，沃恩的讲演没有提到方法论个人主义所面临的问题，然而这是无法回避的。如果不放弃严格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奥地利学派的学习和制度理论恐怕就无法得到深入的发展；反过来如果放弃方法论个人主义，它今后的发展还能叫做奥地利学派吗？这种悖论告诉我们，奥地利学派面临着突变。1976年出版的《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基础》在奥地利学派的复兴中是一本指南性的著作，该书的编者多兰在导论性的论文中，把奥地利学派看做库恩式的科学革命。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目前的奥地利学派无法单独承担起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重任，这也是演化经济学的其他流派无法独立做到的。